



大中华酒楼创始于1930年，以“武昌鱼”为特色名扬四海，2010年认定为“武汉老字号”。



扬子江品牌创建于1956年，坚持“古法原香，传统手工”的品牌诉求，2015年认定为“湖北老字号”。

武汉文史资料

WUHAN CULTURAL & HISTORICAL DATA

2022年第5期(总第355期)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周晓琦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冯天瑜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陆永初 涂文学 萧志华 彭小华

董宏猷

编委会主任：张明权

编委会副主任：朱向梅 李定君

董菲 杨华

陈国方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焕桥 王四清 朱永利 任丽英

刘海燕 李文洲 李运玲 杨蒨

张智勇 陈胜利 林伟 陈红英

徐莉

主编：陈国方

副主编：朱伟峰 丁星火

执行主编：丁星火

特约编审：简桦

本期责任编辑：许濛

编辑：严濂 郑雅飞

特约编辑：华蕾 张川蕾

游迎

封面设计：王鹏

老字号脉

- 4 大中华光耀中华饮食经典 / 卢永忠(口述) 王艳红(整理)
- 9 扬子江：传承不守旧 创新不离宗 / 梅红运

九城同心

- 13 鄂州历史文化简介 / 夏建国 杨小杰
- 15 武昌鱼史考 / 艾三明 郭晓春
- 19 打响鄂南抗日游击第一枪 / 邓文兴 杨小杰

三镇拾遗

- 22 汉阳剧场的时光流影 / 麻建雄
- 26 青山有座青山矶 / 桂枫

委员天地

- 29 在城市“修补”中自我完善 / 董菲
- 34 脚踏泥土 利他致远 / 刘鹤

目录

CONTENTS

人物春秋

38 1957，初见大师陈伯华 / 俞啟凤

商聚汉皋

42 从“插座大王”到“豆芽大王”
/ 余建栋（口述）许濛（整理）
46 踏准节奏追梦大健康 / 沈献礼

都市史话

50 武汉老会馆大起底 / 万建辉
56 汉口江滩一期工程回顾 / 吴世纬

史海钩沉

60 英国发现 1927 年中华全总致驻华水兵公开信
/ 胡全志 范榕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大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 价：8 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82220669（传真）

E-mail：whzxwzsl@163.com

大中华光耀中华饮食经典

◇ 卢永忠（口述） 王艳红（整理）

【老字号小档案】

大中华酒楼创始于1930年，由章在寿等18位安徽商人创办，原址在武昌彭刘杨路196号。

1956年6月，毛主席来武汉视察期间品尝了大中华武昌鳊鱼，一首《水调歌头·游泳》传诵“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名句。从此，大中华以“武昌鱼”为特色名扬四海，广受顾客青睐。

在武汉，想吃正宗的“武昌鱼”，首选必是大中华酒楼。

大中华始于1930年，是一家以经营鱼菜为主的中式餐馆。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但凡过生日、办婚宴、请客，如果能在大中华摆上几桌酒席，那才是“特有面子”的事情。时至今日，经常可以看到慕名而来的白发老人，身边围绕一群儿孙，寻找当年的记忆。

我1987年进入大中华厨房当学徒，深受老字号文化的熏陶，一路走来一路成长。从和煤、打杂、杀鱼开始，跟随我的哥哥卢

2009年，武汉天龙投资集团恢复大中华经营，现有光谷、户部巷、汉口里、徐东四家连锁店，主要经营以“鱼菜”为代表的湖北特色风味。

大中华2010年认定为“武汉老字号”，荣获国家五钻级酒店酒家示范店、五叶级绿色餐饮企业、楚菜餐饮名企等称号。

永良（大中华第三代掌门人、中国烹饪大师），学习制作湖北特色的手工鱼圆、肉圆，直至今日成为第四代掌门人。现在，我担任大中华总厨师长，以“打造百年老店”为长远目标，以传承和光耀中华饮食经典为职责。

大中华擅长烹鱼，扬名海内外靠的是武昌鱼。武昌鱼在我国餐饮史上驰名已久，南宋名相、大诗人范成大《鄂州南楼》一诗吟道“却笑鲈乡垂钓手，武昌鱼好便淹留”，认为武昌鱼之美胜过他家乡的鲈鱼。1956年6月，毛泽东主席到武汉视察工作，三游

长江后品尝了大中华鳊鱼，激情迸发，挥笔作词，写下“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名句，成就了大中华与武昌鱼的美名。

安徽人合股创办

大中华创办于1930年，主要创始人安徽人章在寿，他12岁就在武昌同庆酒楼当学徒。同庆酒楼是一家徽州风味餐馆，以经营红烧鱼面为主。由于他勤劳肯干，不怕吃苦，深得老板胡桂生喜爱，很快学到一手做徽菜的好手艺。

1930年，章在寿离开同庆酒楼，与程明开等合伙自立门户，盘下了武昌芝麻岭的五香斋餐馆，仍以经营红烧鱼面为主，生意很快兴旺起来。当时，上海有三家徽州餐馆都叫大中华，章在寿股东中又有3人是在上海学的烹饪手艺，因而也经营徽州风味，把自家餐馆取名为“大中华酒楼”。

1932年修建马路，餐馆拆除，大中华搬到柏子巷口，即繁华长街的彭刘杨路口。这里位置好，营业扩大，股金总额最多达到5200银元，由章在寿任经理。

大中华经营有道，注重特色，讲究质量，对服务规范有明确要求：顾客进门，笑脸相迎；迎客安座，服务周全；香茶先送，毛巾后行；送上菜谱，任客挑点；介绍品种，替客参谋；餐后结账，征求意见；热情相送，欢迎再来。服务接待方面，除堂头（服务组长）外，还分照堂（服务员）和帮堂（送菜员），堂头由股东担任，全面负责店堂事务，也直接参与服务接待。

初创时的大中华，只是一幢旧式两层楼房，算有一定规模。一楼卖经济客饭，三五角钱，一菜一汤，饭管饱；兼营一些面点，经济实惠，因此受到顾客欢迎，学生、小职员和底层劳动者川流不息。二楼做各种炒菜，后来发展到承办筵席、经营合菜。这些均以鱼菜为主，如清蒸鳊鱼、网油松鼠桂鱼、糖醋桂鱼、五彩桂鱼、牡丹桂鱼、银丝桂鱼、青鱼划水、瓦块鱼等。二楼的顾客大多是社会中上层人士，以各级官吏、高级职员居多。由于地处法院对面，许多官司的诉讼双方宴请法官、律师时就近安排。偶尔，也有省市要人光临品尝，生意日渐红火。

20世纪30年代初的武昌，餐饮业一度较为繁荣，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在大中华附近，就新开了汤四美汤包馆、蜀珍川菜馆、汉宾酒楼、味腴餐馆等，都对大中华构成了直接挑战。其中，尤以汤四美为最，它既卖汤包，又兼营小炒，还承办筵席，加上老板汤荣昆活动能力强，震寰、裕华等几大纱厂及米厂、电厂等都被他拉到汤四美包席。

面对强劲对手，大中华果断采取应对措施：首先，重新装修门面并扩建三楼，将三楼店堂布置成活动客间（包房），可大可



1990年代初大中华酒楼（武昌区彭刘杨路）

小，以满足顾客需求；其次，严把质量关，进货选料十分讲究，还专门制作了土冰箱保证原材料新鲜；第三，用原汤做菜，原汁原味，以达到口感鲜美。由于这些改进，大中华嘉宾接踵而至，人气兴旺，省内无匹。

当时社会上流传一种说法：吃菜要上“行时”的餐馆，喝茶要上“背时”的茶馆。意思是“行时”的餐馆生意好，原材料销得快，食品新鲜；“背时”的茶馆生意差，水烧得很开。为了办成“行时”的餐馆，大中华除了十分注重菜的质量外，还要求服务员善于向顾客推介，因而总在激烈的竞争中占得上风。

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件，日本侵略军进攻吴淞口，许多有钱的下江人逃难到武汉，成为餐馆的常客，许多餐馆发了小财，大中华也不例外。1936年，大中华修建了一座500平方米的3层楼房，开始经营徽、浙名菜，进入一个鼎盛期。

1938年10月，武汉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昌最热闹的长街一带餐馆大多关门停业。由于大中华的股东均为安徽人，家乡早已沦陷，无乡可归，只得在这里财命相连，硬着头皮苦苦支撑。长街中心地段被日军占据，小型餐馆纷纷迁到八铺街难民区一带集中，像大中华这样原地坚持经营的寥寥无几。由于生意清淡，又缺乏资金，股东、员工都不拿工资，生意好就吃早点，生意差就吃差点，生活非常艰苦。

武汉沦陷的7年中，大中华经营艰难，勉强维持。章在寿挺到1944年，不得不弃店回乡，经营由其他股东接手，暂且糊口度日。

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国民党政府滥发钞票，引起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市场萧条，民不聊生。官吏横征暴敛，苛捐杂

税多如牛毛，再加上国军伤兵经常闹事，更是难于应付。大中华的生意越来越做不下去了，日渐衰弱。

武昌鱼独领风骚

新中国成立后，大中华重现生机，获得了长足发展。1957年公私合营后，发展成为国营企业，以烹制武昌鱼的特色占据三镇一方。

1956年6月初的一天，大中华接到一项重要接待任务——中央首长来此用餐。经理立即召开厨师会议，按照“原料新鲜、烹饪精细、特色浓郁、品种多样”的原则，认真研究菜谱，设计了10道鱼菜：清蒸鳊鱼、杨梅鳊鱼、松鼠鳊鱼、抓黄鱼片、拔丝鱼条、汤粉鱼、如意鱼、荷花鱼和徽式传统的青鱼划水、清炒鳝糊。另加两道蔬菜和一道空心鱼圆汤。事后得知，此次接待的是我们的敬爱领袖毛主席。

不久，毛主席发表《水调歌头·游泳》一词，开篇就是“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武汉市财贸办公室主任王健对武汉市饮食公司经理提出要求：要根据毛主席的诗句，搞一个“武昌鱼”。

不久，市财贸办公室组织二商业局、水产公司、饮食公司有关人员，邀集全市名厨共同研究“武昌鱼”，各显身手，精心试制。考虑到团头鲂（又称樊口鳊鱼）为湖北特有的代表性鱼种，肉质鲜嫩，形如银盘，恰好毛主席品尝过，樊口鳊鱼就与“武昌鱼”挂上了钩。1959年，在大中华召开了“武昌鱼”命名大会。

从此，大中华更加突出经营特色——以烹制武昌鱼为主的淡水鱼类菜肴。酒楼继承传统，不断创新，在原来几十种传统鱼菜

的基础上，发展到 500 余种，其中仅武昌鱼的做法就有 30 多种，如花酿、杨梅、荷包、梅花、菊花、蝴蝶武昌鱼等，各具特色，色香味形俱佳。那时鲜鱼紧俏，大中华却获得了一项“特权”：所有供鱼点首先保证大中华的供应。哪怕遇上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别家连死鲢子鱼都拿不到，而大中华还能分配到青鱼和鳊鱼。

由于武昌鱼的推出和不断创新，大中华名声大震，许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以“到大中华酒楼品尝正宗武昌鱼”为快。一些人甚至认为：“不食武昌鱼，枉自到武昌。”这一时期，是大中华最辉煌的时期，每逢节假日，订个座位还得托人“开后门”。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中华又发展创新了包括鳊鱼、青鱼、鳊鱼在内的“全鱼席”系列及“一鱼多吃”菜品，推出了红枣炖甲鱼、虫草八卦汤、莲茸鱼夹等一批滋补食疗菜肴，同时发掘整理了荷香鱼、鱼羹等一批颇具楚乡风情的传统佳肴。

解放后，大中华先后进行了三次扩建装修，尤其是 1991 年竖起了 5 层高楼，面积扩大到 6000 平方米。设有喜庆、赏湖、揽江、望云、闻鹤、佳会、楚乐等大小宴厅 10 余个，可供 1500 人同时进餐。二楼大厅气派豪华，格调高雅，揽江厅悬挂着气势磅礴的长卷《万里长江图》。此外，还设有鹤翩舞池、酒吧等现代服务设施。

大中华注重厨师的培养，学艺之风浓厚，薪火相传，名师辈出，业内称之为“厨师的摇篮”。老一辈名厨有程明开、邵观茂、邵在维，1970 年代前后有李双文、柳学鸿、黄昌祥，1980 年代有卢永良、余明社、许哲祥。1980 年代，三级以上厨师和服务技师占到职工总数一半以上，其中卢永良、余明社评为国家级烹饪大师。他们参加全国烹

饪大赛屡获大奖，卢永良还当选为中国烹饪协会副会长。

大中华十分注重企业管理，1989 年评为“国家二级企业”，1992 年成为武汉市饮食行业十家最大企业之一。1993 年，销售额突破 1000 万元，利润达 137 万元，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名列武汉市同行业前茅。

此后，由于市场发生急剧变化，大中华的机制弊端逐渐显露，经营开始下滑。虽多次改变经营模式，均无力回天，于 2006 年 8 月歇业。

新理念复兴起航

2009 年 7 月，武汉天龙投资集团以保护和弘扬中华老字号为己任，决定恢复大中华经营，我也回到大中华全面掌厨。

2010 年 9 月 18 日，新大中华盛装开业，地处光谷地区中心雄楚大街与天龙路交汇处。酒楼建筑面积 4900 平方米，其中营业面积 2240 平方米，可同时接待 600 位宾客，停车场有近 100 个泊车位。

走进店内，光亮的大理石地板、巨大的门扇屏风、金咖色色调、璀璨的时尚吊灯扑入眼帘。餐桌摆件、杯盘器皿乃至菜单上的“大中华”印章，都经过匠心设计，颇有“大巧必工”的意味。

历经 13 年发展，新大中华积淀了浓厚的文化底蕴，形成了良好的消费者认知和口碑基础，来源于不断创新经营管理理念。如果一味按照“老大中华”的套路来做，那我们恢复的仅仅是一个“古董”；只有继承大中华历史文化中的精华，融入现代化管理理念，与时俱进，洗去沉疴，大中华才能真正“活”过来。

因此，在改革的道路中，我们构建了

企业理念、企业精神等企业文化系统，制定了全套国标文件管理体系，实施了以提升出品、服务两个质量管理为核心的组织架构和管理运行系统。

在产品创新方面，我们确立了“传承、创新”的产品决策原则，按照“湖北特色”“大中华酒楼经典”“现代风格元素”相结合的方式，推出具有湖北特色风味的产品和服务，形成老字号企业的经营定位和风格。确立了“基本功传承不丢失，工艺传统不丧失，湖北特色不遗失，大中华酒楼经典不流失”的出品质量管理原则。

就拿大中华的招牌“清蒸武昌鱼”来说吧，我带领厨师团队经过无数次潜心研究，以市场为导向，依据顾客口味需求，逐步改良制作工艺。首先，鲜活的武昌鱼，必须通过标准的宰杀程序一步到位，而不是宰杀后乱跳逐渐止息，这是有讲究的。按标准执行，则鱼肉白皙、光泽度好、肉质细腻、味道鲜美。其二，将鱼放进蒸锅前，先用60℃热水将鱼的两面快速焯一遍，更好地清理鱼身上未刮净的鳞片。其三，刮去鱼肚内的黑膜，去除鱼腥味。完成以上步骤后，按程序放入猪油及姜、葱等调料，鱼才可以进蒸锅，至8分钟后取出，顾客就能品尝到地道的“大中华清蒸武昌鱼”了。就这样，我一直秉承着尊重烹饪艺术的理念，培训我们的厨师团队，一定要让每一道特色菜品都具有量身定制的工艺流程，以赋予其真正的灵魂。

在生产模式方面，我带领团队不断研讨，创建了顺应现代餐饮企业发展必备的“中央厨房连锁配送”等新型餐饮理念，结合行业内成功的实践经验，设置了专门加工原材料的加工间，所有原料统一采购、加工、储存、配送，每份净菜独立包装，才进入厨房操作间生产出品。

在经营定位方面，我们形成新型“老字号”企业的经营定位和风格，并完善相对应的经营策略。提供具有湖北风味的“小吃+小炒”的组合，作为武汉地区的创新模式，深受各种顾客群体的青睐。我们挖掘湖北饮食文化的深度，菜品的口味、风味、品味相得益彰，成为广大消费者不得不到大中华来进餐的理由。

在经营和服务模式方面，我们确立了“关注顾客消费后的感觉，分析顾客满意度”的服务质量管理原则。

在管理创新方面，我们确立了“谁做谁写，写我所做，做我所写”的标准化创建原则，学标准、建标准、贯标准、用标准成为出品、服务质量管理的创新模式。

高度重视员工在企业运作中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视员工的目标认同，构建股东、企业、员工利益共同体，倡导团队精神，激励和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圆满实现质量管理目标。

这就是我们大中华人的精神：传承中华饮食传统经典，演绎新型饮食文化发展模式，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饮食文化精髓；以保护和弘扬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百年老店为兴业使命；以传承和光耀中华饮食经典为神圣职责，将大中华酒楼品牌打造成为精品服务连锁发展的典范、著名餐饮企业品牌和城市文化名片。

卢永忠，武汉天龙大中华酒店有限责任公司行政总厨；王艳红，武汉天龙大中华酒店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扬子江：传承不守旧 创新不离宗

◇ 梅红运

【老字号小档案】

武汉扬子江乳业食品有限公司，前身为国营武汉市牛奶公司，现成长为湖北省以生产传统手工食品、地方特色食品、节令食品为主的大型龙头企业。

扬子江品牌创建于1956年，坚持“古法原香，传统手工”的品牌诉求，产品涵盖八大系列300多个品种，通过了

ISO9001:2008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2015年，扬子江认定为“湖北老字号”。2016年，扬子江传统糕点制作技艺入选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目前，扬子江作为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走上文化创新发展之道，致力于打造湖北非遗糕饼文化园产业。

“古法原香，传统手工”——这句耳熟能详的广告词，彰显了扬子江的独有诉求，昭示着这家老字号历经60年传承创新，已成为湖北传统食品行业的闪亮品牌。

养牛挤奶办起食品坊

我的父亲梅成宗，3岁时父母就相继去世，由两个兄长梅昌云、梅昌华抚养成人。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日伪统治时期，父亲被迫帮日本人做饭，过着奴役般的生活。

日寇投降后，勤劳的父亲靠做豆腐、臭干子维持生计。稍有点积蓄后，就以养牛挤奶为生，逐步有了10多头奶牛的规模。1949年前的汉阳莲花湖畔，有一群养牛户，为首的便是我父亲。

在此基础上，父亲开始从事食品加工生产，即油炸双色小麻花，以及用牛奶做配料，生产奶油蛋糕、奶酥面点等传统特色食品。创业之初，父亲就非常注重产品品质，选用上好面粉，配以奶油加工成型，烤制各种口味的面点。双色小麻花的制作，则选用轧制提炼的花生油，与面粉和料，配以蜂蜜、

糖浆搓成，入口酥脆，油香浓郁，受到食客的喜爱。

1956年公私合营，组建“武汉国营畜牧场”，父亲带着他的奶牛入股，成为了“武汉国营畜牧场”的股东。

1956年兴建武汉长江大桥，畜牧场第一次迁址到武昌晒湖堤，仍旧从事乳制品生产及食品加工。至1960年代，畜牧场更名为“武汉市牛奶公司”，启用了“扬子江”品牌。

子承父业走上创业路

因为我从小受父亲的影响，一直对食品行业怀有深厚的情结，1982年父亲退休，我顶职进入武汉牛奶公司，从事加工生产，参与技术和质量的管控。

进入1990年代，牛奶公司改制，我被买断工龄“下岗”。然后，我召集十几名下岗员工，与牛奶公司达成协议，由我担当法人代表，成立“武汉市牛奶公司扬子江食品中心”，同父亲当年一样白手创业。

“扬子江食品中心”在武昌彭刘杨路202号，实行前店后厂模式，主要生产经营具有湖北地方特色的小食品。我沿袭父亲的制作工艺，生产油炸双色小麻花及奶油饼干、奶油蛋糕、面点等。

运行之初，在资金、设备设施、人员、技术等方面，还是遇到了一些挑战。市场竞争激烈，原国有武汉食品公司旗下的几家大品牌厂家，在市场上占有一定优势；还有几家先行运作的民营食品品牌，在规模和市場影响力方面，也都在扬子江的前面。扬子江要想在市場立足，必须比别人有更多的付出。我下定决心苦练内功，立下了“艰苦奋斗、发愤图强”的誓言。

彭刘杨路店子经营规模不大，几个案板，几条板凳，我带着十几名员工在车间一起生产，从早忙到晚，忙完生产忙包装，忙完包装忙送货。我最擅长的绝活是搓麻花，搓得又快又好，即使技术熟练的老员工也干不过我，大伙儿还给我起外号叫“小麻花”。

传统糕点食品特别是节令食品（春节、端午、中秋），季节性很强，时间紧，任务重，员工需要日夜加班。我就吃住在厂里，和员工一起连轴转，通宵达旦。晚上把产品做好，白天我骑自行车一家一家小商店送。靠着这样拼时间、拼体力，赢得一份份市场份额。产品质量和品牌信誉，逐渐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起来了，产品的品类也不断丰富。

请来名师开发新产品

1999年8月，我在“扬子江食品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了“武汉市武昌扬子江乳业有限公司”，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注册了“扬子江”品牌商标，生产地址迁至武昌梅家山（租用国有企业的闲置厂房），从此，企业步入了新的发展轨道。

社会发展很快，生产经营规模在扩大，企业内部管理及对知识和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越来越认识到，没有知识是难以驾驭一个现代化企业的。

因此，我在繁忙的工作中，坚持抽空“充电”，使自己不断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通过业余学习，我先后取得了湖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经营专业、江南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专科文凭。随后，顺利通过了高级经营师的资格考核，又取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EMBA 经济管理学硕士研究生文凭。

我不仅自己学，还鼓励员工学，出台规定：公司老员工只要通过自学取得文凭

和职称，公司除了报销全部费用外，还在每月的工资结构里，固定给予学历、职称补贴。这个时期，企业与外界的交往越来越密切，相互学习借鉴，相互交流合作，视野不断开阔。

随着品牌影响力的提升，我开始重视扬子江团队的打造，一方面内部培养，一方面外聘人才。我“三顾茅庐”，请来武汉食品行业的技术名师李良庆、“拉糖皇后”王玉蓉夫妇，使扬子江食品的品质又上一个台阶。

李良庆师傅出生糕饼世家，从祖父起家，就开始经营福源祥糕点作坊，其金糕、姜糖、花嵌糖名传三代。李良庆随父从江西做到湖南，从湖南做到湖北；食品烘烤从中点做到西点，从苏帮做到粤帮，食品中的主要产品京果、酥糖、杂糖、粽子、绿豆糕、芝麻糕、月饼等，生产工艺无一不晓、无一不精。王玉蓉是李家的童养媳，从业后在黄石食品厂做过技师，对港饼、麻糖、姜糖、花嵌糖及桃片、云片、烘糕等技术精通。

两位名师的加入，扬子江食品开始在产品提档升级和研发上下功夫。第一个产品放在“大法饼”的改良升级上，从原料到外形加以创新。市面上的法饼，主要原料是面粉、食糖加酵母粉发酵而成。改良后，加上蜂蜜和牛奶，改用米酒发酵，成了牛奶发饼，营养成分大有提高。同时将大法饼改为小圆饼，每500克32个，可作为休闲零食，一口一个，越嚼越有味，适合老人和小孩，特别是小孩可当奶糕食用。小圆饼一经上市，就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一天的销量达3吨多，这对扬子江来说相当于放了一颗“卫星”。

此时，扬子江食品开始由副食品店、百货商店向商超体系进军，迅速在中百、武商、中商、麦德龙、家乐福、华联、沃尔玛等大型商超全面铺开。产品类别也从创业初

期的十几个简单品种，扩展到烘烤、油炸、蒸煮、膨化、熟粉、糖果、鱼罐头、炒货等八大系列的300多个品种。

市场竞争面临新挑战

2003年11月，在武汉市全面推行国有企业改制的进程中，扬子江响应号召积极参与改制，在武昌区紫阳街办事处的主导下，协议收购了国有武汉粮食机械厂，妥善安置国有职工。

2004年6月，扬子江整体搬迁至武昌栅栏口88号，并设立了扬子江工业园。逐渐添置新式烘焙机械等先进设备和生产流水线作业，在确保传统食品质量和风味的基础上，进行了结构调整和工艺改良。

我们强化“扬子江”品牌在湖北传统食品行业的领先地位和广大消费者心目中的喜爱程度，负责起草制定绿豆糕湖北地方标准，还作为中部地区代表参加全国月饼标准的修订。2012年成功举办了第八届中国粽子文化节，打破了前七届都由政府主办、企业协办的惯例。

根据市场变化及企业经营需要，2012年将“武汉市武昌扬子江乳业有限公司”更名为“武汉扬子江乳业食品有限公司”。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运行，快节奏带来市场变化，让传统手工为主的食品企业又面临新挑战。一方面，西式糕点涌入及休闲食品以口感新颖、食用方便、包装讲究等优点，迅速抢占了一部分市场份额，特别受年轻消费群体的青睐；另一方面，中式糕点保持传统工艺，配料单一，少有各种添加剂，经过烘烤后产品含水量极低，口感也自然显得干硬。而且，中式糕点生产需要大量人工，劳效不高、出品率不高，成本却不断攀升。

由此带来的思考是：传统糕点食品还要不要坚守？

扬子江给出的答案是：不仅要坚守，而且要传承、要创新、要发展。

文化自信拓展新思路

市场在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也要变。面对挑战，需要目标一致、认识一致、行动一致，产品经营与品牌经营一起上，做到“传承不守旧，创新不离宗”。

赋予传统食品更多的文化内涵，做到极致就是文化。2012年1月4日，扬子江成功摘取江夏区大桥新区107亩工业用地，借此规划了以传统食品生产经营与文化旅游相融合的发展方向。大家达成共识，实现目标必先练好内功。秉持“好原料、好工艺、好制作”理念，稳固老产品（京果、酥糖、杂糖等），改良创新部分老产品（武昌鱼风味粽、青稞粽、莱菔子月饼、荆楚汉饼、鸿运步步糕、牛奶小圆饼等），适应市场需求推出新产品（冰晶粽、樱花饼、冰皮月饼、桃山皮月饼系列等）。积极参加全国、全行业各类评比、大赛，荣获“中华名饼”“中国名饼”“创新产品”“湖北省著名商标”等各种奖牌，扬子江传统糕点制作技艺入选湖北省非遗项目。

2015年，扬子江推行内部“股权激励方案”，全体干部员工按不同职位、岗位分成5个级次，分别配备“身股”，同时按级次的比例交纳“银股”。公司确定年度考核目标，年终考核根据超利润分成，计算“身股+银股”每股应得的股利，然后分三年兑现，让员工既有劳酬收益也有股权收益，不仅激发干劲，而且对稳定团队起到了积极作用。

2017年，新厂第一期主体工程建设，完成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按现代化工厂要求配套，从原料预选、配料、成型、烘烤、冷却消毒、内包间、外包间等流水线作业，实现了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相结合。

2018年，扬子江湖北非遗糕饼文化园诞生。园内的扬子江非遗文化馆两层结构，建筑面积达1500平方米。一层前端设有产品故事厅（传统糕点发展史）、原料厅（原料来源及性能）、非遗戏台、文化长廊（城市老照片和企业老工具展示），后端设有制作表演区、糕点展示区（可品尝）、饮食健康科普厅；二层整体为喜文化厅，结合人生成长节点，讲述糕饼故事，如：结婚礼俗、一岁抓周、开笔礼等。馆外配套了景观园林和非遗广场——100项代表性湖北省非遗项目目标牌镶嵌两旁的绿化墙上。

2019年，扬子江非遗文化馆评定为国家AAA级景区，作为“观光工厂”全面对社会开放，游客可参观生产车间的现场制作（设有专门参观通道）。它作为中华糕饼文化传承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同时与华中农业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合作开展研学项目，两年来接待中外大学生和中小学生数万人参加体验活动，使之亲身感受中华传统糕饼文化的博大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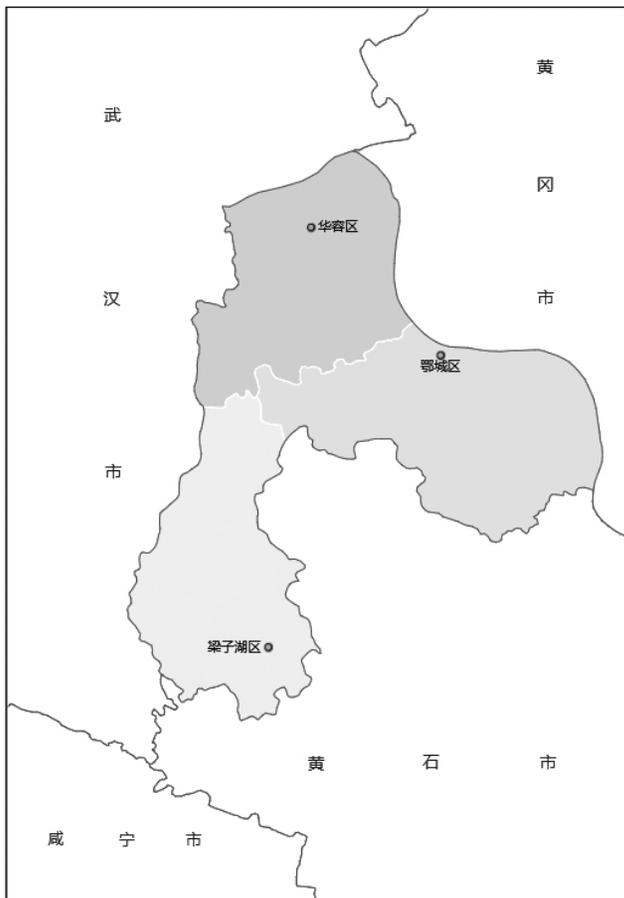
老字号扬子江，以一种独特的文化方式焕发青春。它坚持以做老百姓放心的食品为己任，以不断满足消费者日益变化的物质文化需求为永远目标，用新理念、新能力、新作为创造新的业绩。

梅红运，武汉扬子江乳业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鄂州历史文化简介

◇ 夏建国 杨小杰

湖北省(鄂) - 鄂州市
(省会武汉)



审图号：GS(2022)1873号

湖北历史文化名城鄂州，是省辖地级市，现辖3个区、1个国家级开发区和1个省级临空经济区，总面积159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08万。鄂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遍及城乡的新石器时期村落遗址，以及宋《路史·国名纪》“帝尧时有樊仲文，今武昌有樊山”记载，见证了鄂州5000年文明。殷商三公之一的鄂侯发展至樊地，与后来楚国熊渠在此封鄂王，是湖北简称“鄂”的源头。魏黄初二年（221年）孙权来鄂县建都，改名武昌，是武汉城市圈“武”字的历史出处，也使鄂州成为中国三国文化之乡。湖北文史专家刘玉堂认为，樊鄂楚吴文化和唐宋元文人留下的文化瑰宝，奠定了鄂州历史文化在全国所具有的特殊地位。

进取建功文化一脉相承。楚以在鄂首封三王印证“不服周”，还为这里开启湖北唯一王城帝都历史。孙吴“以武昌”，为三国最终形成收官。此后陆

逊、陶侃、庾亮、岳飞、彭玉麟、彭德怀、李先念、王震等叱咤风云将帅先后在此征战建功，贺龙直接从鄂城县出发担任南昌起义总指挥。历史上鄂州也走出无数英杰。熊桴成为明代抗倭英雄。彭楚藩、程正瀛、吴兆麟分别是辛亥革命牺牲第一人、打响第一枪之人和第一个总指挥。中国共产党起步发展时，范鸿劼跟李大钊一起创办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亢慕义斋，刘伯垂受陈独秀指派参与创建湖北第一个党组织，赵子俊代表刚成立的中共出席共产国际会议。

江南水乡文化绚丽多姿。被梁启超称之为“殊不在风骚下”的《鄂君歌》，开篇吟的是“今夕何夕兮，擘舟中流”。楚国诗人屈原曾鄂渚行吟。东晋陶侃坐镇武昌从严治军，在河湖岸边催生“官柳”文化。南北朝武昌人戴凯之撰写中国最早竹科专著《竹谱》，是水乡农耕文明的结晶。挺立大江近700年的观音阁，以其独特魅力驰名中外。毛泽东“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让中国武昌鱼美食之乡花落百湖之市鄂州。

矿冶物流文化横亘古今。鄂州境内矿产资源富集，鄂和楚先后在此冶炼钢铁。鄂君启舟车金节见证这里曾是长江流域物流商贸枢纽，还是考证我国古代商贸交通税务史的实物。孙权建都迁来千户能工巧匠，武昌成为三国时代四大产铜铸镜中心之一，为鄂州赢得中国古铜镜之乡美名。近现代鄂州是冶金建材走廊，世界第四个、亚洲第一个专业货运机场——鄂州花湖机场成功校飞，鄂州正全力打造国际货运枢纽城市。

开放包容文化硕果累累。《鄂君歌》（又名《越人歌》）见证了长江流域不同文明的融合。三国武昌成为绾毂四方之地，西和北有异域高僧来此翻译佛经，南有古罗马商人秦论前来拜谒交流，东有武昌铜

镜漂洋过海到日本，这些是古丝绸之路在长江流域孕育萌芽的实证。慧远挂锡西山使这里成为净土宗发祥地之一。现当代鄂州领开放风气之先，成为湖北综合改革试验区和武汉城市圈同城化先行市。

厚重书法文化流光溢彩。楚国鄂君启节上的金文、三国武昌官制铜罐上的刻字，以及从战国绵延至今的铜镜铭文，是鄂州书法文化的历史底色。武昌参军王羲之南楼赏月佳话与书圣美名一同蜚声华夏。李阳冰怡亭铭摩崖石刻以唐篆隶铭三绝闻名于世。苏轼《武昌西山》入选《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黄庭坚《松风阁》被称为天下第九行书。晚清张裕钊书法风靡日本，康有为夸其“千年以来无以比”。如今鄂州书法传承蔚然成风，是湖北省书法艺术之乡。

民间民俗文化争奇斗艳。布贴画在鄂州民间流传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是传承吴楚文化的特殊载体，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当代鄂州艺人制作的布贴画多次列入全省民间工艺精品，乃至于闻名遐迩，畅销海内外。自南北朝，鄂州就流行剪纸艺术，并发展成为花样剪纸的发源地之一，鄂州雕花剪纸与牌子锣、旱龙舟、嵩山百节龙等均被列入国家级非遗目录。春节期间，鄂州嵩山会举行特大型龙灯祭游民俗活动，称为“百节龙”，共101节、总长400余米，每届游玩需组成500人的玩灯队伍，传承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彰显出浓厚的中国龙文化。

夏建国，鄂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杨小杰，鄂州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工作科副科长

武昌鱼史考

◇ 艾三明 郭晓春

好水养好鱼，好鱼更养人。世世代代与武昌鱼朝夕相伴的梁子岛渔民，百岁人众多。故梁子岛又被誉为“长寿岛”。清澈的碧波中鱼儿悠悠，岛上鸟语花香，男渔女织。每夕阳西下，樯桅罨影，有童颜鹤发，渔歌唱晚；又见闲云野鹤浮掠其间，平沙落雁，鸳鸯戏水，怡然自乐。好一幅世外桃源图！

武昌鱼，自然是武昌的一种鱼。可令人困惑的是，历史上有三个武昌：一个是古武昌（今鄂州），一个是今武昌（现武汉市一个区），一个是民国时设置的武昌县（后改为武汉市江夏区）。三个武昌，哪里才是武昌鱼故乡，历来颇有一番争论。

武昌鱼寻根

鄂州古称鄂，宋代武昌县令薛季宣在《鄂墟赋》中形容：这里“有峰有峦，有陂

有泽，林麓苍苍，环流漾碧，万顷涟漪，际天一色。”西周末年，楚王熊渠“伐庸、杨越至于鄂”，封中子红为鄂王。熊渠卒后，熊红继位，乃都于鄂。熊红传六世至熊罥，仍都于鄂。

楚人是冲着鄂地丰饶的铜铁资源而来。在青铜时代，铜铁资源是一方霸主梦寐以求的巨大财富。鄂地的管辖范围大致包括今黄石、大冶、武汉、蒲圻、咸宁、通山、通城、崇阳、阳新、嘉鱼等地，基本上囊括了整个鄂东南地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此地设县，称鄂县。三国时，孙权于公元221年来这里建都，并改鄂为武昌。“武昌”，是要以武力而昌盛的意思。

这是武昌之名的由来。

孙权建都武昌（今鄂州），首先就做了一件震惊于世的大事，即《三国志》中记载的“移民千家”来鄂。为兴建东吴都城，



梁子岛生态旅游区

孙权不惜一切代价，举江东之人力物力集中于武昌。十数万人离乡背井，扶老携幼，千里迢迢而来，使武昌的采矿、冶炼、造船、筑城、制铜镜、烧瓷器、农业等经济建设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奠定了“天下三分”的物质和政治基础。同时，也为武昌鱼的由来埋下了伏笔。

孙权在武昌帝都修筑了金碧辉煌的武昌宫、安乐宫等宫殿。其修筑宫殿的用料讲究，据《舆地纪胜》记载：“宫中古瓦皆澄泥为之，可以为砚，一瓦值万钱。”但孙权自夺回了借给刘备的荆州后，考虑到东吴西界无虞，便于公元229年将都城迁到了建业（今南京），武昌成为东吴的西都、陪都。

太元二年（252年），孙权卒，大臣诸葛恪挟天子当政，派人重修武昌宫，准备迁都武昌。后因事变，诸葛恪被杀，迁都未果。甘露元年（265年）二月，末帝孙皓又修武昌宫，率文武百官再次迁都武昌。

数次迁都，造成东吴朝廷上下一片“扬土百姓，溯流供给，以为患苦，又政事多谬，黎元穷匮”的怨艾之声。于是，民间便有“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的童谣流传。左丞相陆凯斗胆为之

上疏皇帝，引用童谣，力图劝阻孙皓迁都武昌。这是最早关于武昌鱼的文字记载。

事实上，对于武昌鱼的产地和武昌鱼的具体名称，博览泛读的毛泽东早有一番研究，并在1975年5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上有一番动人的讲话：“武昌鱼不是今天的武昌，是古代武昌，在现在的武昌和大冶县之间，那个地方出鳊鱼。”古武昌即今鄂州，鄂州也是位于今天的

武昌与大冶之间，鳊鱼，即樊口鳊鱼。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所说的“今天的武昌”，古称江夏，唐代始在江夏县设置武昌军节度使（后改为武昌府），是官方的机构名称，非地名。唐代诗人刘长卿在《孙权故城下怀古》诗中写道：“上下武昌城，长江竟何有？”因为武汉在鄂州长江的上游，鄂州其下，故称上下武昌城。至民国二年（1912年），改江夏县为武昌县，而将称有一千六百余年历史的武昌县改名为鄂城县（即今鄂州市）。1960年，武昌县又搬出武昌，设置在纸坊镇。这就是历史上三个武昌的由来。

何为武昌鱼

古武昌曾是“环流漾碧，万顷涟漪”，今天，鄂州仍是百湖之市、鱼类繁多。武昌鱼究竟是特指一种鱼，还是泛指武昌境内所有的鱼呢？

细想一下，如果武昌鱼是古人泛指武昌的鱼，那么历代的文人墨客绝不会屡屡吟诗作赋称赞武昌鱼，对其念念不忘。再者，古武昌境内鱼类繁多，据《鄂州市志》水产

篇记载，本地鱼类有 21 科 106 种。有的鱼此地有，别地也有。到处都有的“武昌鱼”，就无所谓武昌鱼。当时，东吴下游人士宁愿喝水，也不愿吃武昌鱼。如果武昌鱼是特指一种鱼，则说明当时这种鱼已经很有名气，很吸引人了。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于 1989 年出版的《武昌鱼》一书，对上述疑问做了一番考证，大致提出两个观点：其一，无法考证三国典故中的武昌鱼指的是哪一种鱼；其二，易伯鲁教授于 1965 年第一次把团头鲂（鳊鱼的一种）命名为武昌鱼。

实际上，武昌鱼在古人命名时，已是特指武昌的一种鱼，即鳊鱼。南宋武昌县令薛季宣曾在《鄂城篇》中写道：“死生建业信徒语，石盆古渡犹多鱼。”前一句说的是三国时“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的典故，后一句，指出了武昌鱼的出产地点——石盆古渡。据明代《永乐大典》辑本《寿昌乘》记载：“武昌石盆古渡有石臼遗存。”据考证，石臼在鄂州西山（亦称樊山）的石门山下，退谷之东。与石臼毗邻的就是古武昌著名古迹——钓鱼台。这一带，均属于梁子湖水经九十里长港与江水汇合处——樊口。

西山临樊水一侧的钟乳石受水浪冲击磕撞，形成“杯樽状”的石臼。北来的江水遇石受阻，又形成一处大的洄流和小的洄流，俗称大洄、小洄。大洄在钓鱼台上游的樊口入江处，小洄即在钓鱼台下。（《舆地纪胜》）

鳊鱼有洄水嬉游和群聚深水及岩石缝隙中越冬的特性，故在梁子湖长大的鳊鱼，随秋后外泄的湖水经樊口处入江在河槽深处越冬。此地的洄流和石臼处的深潭就成为鳊鱼越冬的理想场所，这里便以出产鳊鱼而著名。

饶学刚在《东坡鄂东行踪考》中记：“东坡一行到樊口，喜食了樊口鱼，赞其味美，东坡作《鳊鱼》，首次对武昌鱼进行了考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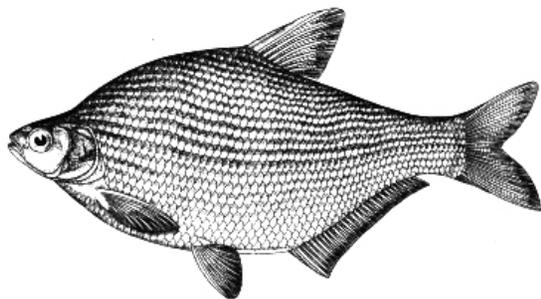
鳊 鱼

晓日照江水，游鱼似玉瓶。
谁言解缩项，贪饵每遭烹。
杜老当年意，临流忆孟生。
吾今又悲子，辍筋涕纵横。

苏东坡深入考究鳊鱼和缩项的关系，“游鱼似玉瓶”，说的是形状。玉瓶，古代瓷器，其状上下窄，颈短，腹鼓，正是鳊鱼的形态特征。古人又称鳊鱼为“缩项”鳊，项，古文通假，即颈也。“杜老当年意”，说的是唐代杜甫曾经写的一首诗，诗曰：“只今耆旧无新语，漫钓槎头缩项鳊。”

光绪年间的《武昌县志》对鳊鱼有明确记载：“鲂，即鳊鱼，名缩项鳊，产樊口者甲天下。是处水势洄旋，深潭无底，渔人置罾捕得之，止此一罾味肥美，食亦较胜别地。”

从以上分析便知，武昌鱼出自石盆古渡，即樊口处，“樊口盛产鳊鱼而甲天下”，那么武昌鱼是樊口鳊鱼无疑。记录此地出产武昌鱼，宋代著名诗人范成大、周端朝在其诗中亦有描述，“却笑鲈乡垂钓手，武昌鱼好便淹留”“晓梦惊辞赤壁鹤，夜栖看打武



武昌鱼

昌鱼”，也形象地反映了渔民垂捕鳊鱼这一盛况。

清代著名掌故家潘钟瑞在《鄂行日记》中也说：“（光绪三年）八月二十日，夜半开驶（长江中），晨起已过黄州府赤壁之地。少时过樊口，为武昌县境，此地鳊鱼最美，世称武昌鱼，非省治武昌府也。”

武昌鱼扬名

鄂东民间有一首反映地方特产的民谚，流传甚广，其曰：“黄州的萝卜，巴河的藕；樊口的鳊鱼，武昌的酒。”民谚中，古武昌最著名的鱼与酒相对，颇受当地人推崇。武昌鱼能被世代相传、吟咏称颂不已，味美，是首要条件。

毛泽东曾在《水调歌头·游泳》诗中自注：武昌鱼是颇有味道的。

武昌鱼生长在梁子湖碧玉般的湖水中，专以青嫩如玉带般的扁担草为食，成熟后，随秋后外泄的湖水，沿蜿蜒九十余里的长港，优哉游哉地游弋到湖水通江汇合处——樊口。长途的跋涉和锻炼，使得武昌鱼此时已是脂肪丰富，肚满肠肥。李时珍《本草纲目》载：“其色青白，腹内有肪，味最腴美。”

据记载，孙权多次在钓鱼台取鳊鱼摆宴，群臣共乐，使得鳊鱼有了被人赏识的机会，为日后的出名做了铺垫。此地有石如翼，笔直伸向江滨，倚幽出谷，其上平旷宽阔，可同时容纳百余人。台畔有绿杨掩映，婀娜多姿，台下则丛石林立，横江截浪。它吸引着后人来此凭吊、吟咏、游览一番，然后又留下令人回味一个又一个典故。

南朝谢朓在《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诗》中写道：“钓台临讲阅，樊山开广燕。”唐代李白极有兴趣地来钓台，与好友黄公共

同写下了著名的《武昌钓台篇》以慰别情。苏轼来钓台，寻觅着前人的足迹，在《武昌西山诗并序》中，留下“浪翁醉处今尚在，石臼杯饮无尊罍”的感叹。近代毛泽东的一句“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诗，让武昌鱼名扬天下。在文人墨客眼里，武昌鱼与钓台，仿佛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创作题材和说不完道不尽的故事。

有趣的是，团头鲂因武昌而出了名，乃至家喻户晓；钓武昌鱼的钓台也出了名，成为古武昌的一大名胜景观；古今诗人到访钓台，吟咏武昌鱼，形成丰厚的武昌鱼历史文化、武昌鱼诗词文化、武昌鱼饮食文化等。武昌鱼传承到今天，在养殖、加工、烹饪、旅游、文化等方面，于武昌鱼故乡——鄂州市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2000年以来，鄂州举办了数届“武昌鱼文化旅游节”，在国内外影响瞩目。第一家以武昌鱼为品牌的龙头企业成功上市。2010年10月，国家工商总局批准“鄂州武昌鱼”为中国驰名商标和中国原产地证明商标。2013年，鄂州市被中国烹饪行业评为“中国武昌鱼美食之乡”。2020年，其以武昌鱼为龙头的水产养殖达40万余亩，渔业总产值95亿元。武昌鱼加工、烹饪企业达130余家，产值16亿元。

这条缩着脖子腆着肚子的武昌鱼，游过千年历史长河，跃入万家百姓桌上，透露出几分亲切、可爱，它成就着新一代的幸福生活。

艾三明，《鄂州市志》编辑，《鄂州市名胜古迹鉴赏》《武昌鱼之谜》主编；郭晓春，鄂州市政协副主席、民盟鄂州市委主委

打响鄂南抗日游击第一枪

◇ 邓文兴 杨小杰

1938年6月，武汉保卫战打响，鄂城成为武汉外围的重要防线。10月20日，日军水陆并进，溯江而上，向鄂城发起攻击。23日，日军占领鄂城县城，随即全境沦陷。为了抗击日军，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中共鄂(城)大(冶)、武(昌)鄂(城)、咸(宁)武(昌)鄂(城)、大(冶)鄂(城)县委和县民主政府先后成立。在这四块抗日根据地里，最早开展抗击日军的军事武装就是梁湖抗日游击大队。

组织起来，吹响抗日集结号

1938年11月，武汉沦陷。中共武昌区委为发动群众、建立稳固的抗日根据地，决定移驻鄂城县涂家垸。这里依畔梁子湖，有山有水，进可以抗击日军，退可在山林和湖里芦苇荡打游击。武昌区委分头在涂镇街附近走访群众，宣传共产党抗日救亡的政策。当时有几名学生与区委取得联系，纷纷要求参加抗日活动，其中有一位书生气十足的青年王骧，主动向区委负责人介绍了自己的经历。

王骧，出生于梁子湖畔涂家垸，1930年在中共鄂城县委开始革命生涯，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奔赴江西入伍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红军连长。他在一次战斗中负伤，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在监狱里遭遇多次严刑拷打，坚持称自己只是一名普通士兵，没有出卖党组织和红军的秘密。1936年底，经家人出面请人帮忙保释回到鄂城县涂家垸。由于当地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几次到武汉寻找党组织未果，王骧只好隐蔽在家乡边读书边等待机会，盼望再一次走上革命道路。

武昌区委负责人听到王骧的自述之后，当即表态请王骧重回革命队伍。王骧即日起将原名王骧改为王甦，以示自己重新得到复甦，找到了新希望。

通过多天的宣传发动，武昌区委在涂家垸建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经反复研究决定，在白云寺举行梁湖抗日游击大队成立大会，张贴布告，明确宣布建队宗旨：抗击日军，铲除汉奸，维护群众，保境安民。

这是共产党领导的鄂南第一支初具规模的地方抗日武装，下辖3个中队，由王水任大队长，王甦任第一副大队长兼一中队队



王甦

长，潘斌任第二副大队长兼二中队队长，况公仆任第三副大队长兼三中队队长，鲁斗南为参谋兼军需主任。大队部和一中队驻扎在白云寺，二中队驻扎在梁子岛，三中队驻扎在涂镇街。梁湖抗日游击队分别在北咀、南咀、徐桥、倪家庄、保福祠等地设立瞭望哨所，随时掌握日伪军及汉奸的动态。

不久，中共鄂南中心县委先后派江萍（女）、胡波、胡传经，以及县委军事部长吴刚到梁湖游击大队工作，分别担任政训员和副大队长。从此，中共武昌区委和梁湖抗日游击大队，在中心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活动。梁湖抗日游击大队经过不断壮大，次年初发展到 500 多人枪。

敢打能赢，保卫家乡勇冲锋

1938 年 5 月初，梁湖抗日游击大队接到哨所的情报，金牛据点的日伪军约 200 多人到涂镇掳掠。当时住在涂镇街的地主恶霸王锡三，与金牛镇维持会会长柯有吉早就暗中勾结，以“保商安民”为借口，妄图在涂家塆建立日伪维持会，扶持王锡三当会长，骗取乡民支持成立维持会。

当天中午，日伪军在涂镇街的彭雨亭“汉江春”餐馆，大吃大喝几个小时。大队部获得情报后当即决定抓住战机，狠狠打击日本侵略军。

大队长王水受伤不能参战，委托王甦代理大队长。王甦指挥一、三中队埋伏在离涂镇街 5 公里的徐桥附近几个山头上，每个山头部署一挺机枪，组成两个火力交叉网；二中队负责堵日伪军退路。

下午 4 点多钟，酒醉饭饱的日伪军摇摇摆摆来到徐桥。待日伪军半数人过桥之后，王甦一声令下，抗日游击队一齐开火。激战一个多小时，日伪军见日渐西沉，不敢再战，匆匆拖走部分伤员夺路而逃。

这次战斗共打死打伤日伪军八九十人，金牛镇维持会会长柯有吉落水溺毙。日伪军遭到打击后，恼羞成怒，次日又来到徐桥，欲报复梁湖抗日游击队。但苦于游击队踪影难寻，只得架起钢炮对四周山头胡乱轰炸一番，然后悻悻归去。这次战斗打响了鄂南抗日游击的第一枪，梁湖抗日游击大队声威大振，极大鼓舞了鄂南人民群众抗日的斗志。

在同仇敌忾的抗日战争中，梁湖抗日游击大队充分运用自然有利条件，对日伪军展开多次武装斗争。1938 年 12 月，王甦率一中队在保福祠活动，接到哨所的情报，有一股土匪在涂镇街抢劫商户的财物，当即决定将一中队兵分三路，包围了这股土匪。激战半个多小时，活捉土匪 30 多人，缴枪 10 多支，手榴弹 10 多枚。涂镇街的商户们喜笑颜开，纷纷燃放鞭炮，祝贺梁湖抗日游击大队的胜利。

同月，梁湖抗日游击大队二中队获知情报，保安据点的日军出动 3 艘橡皮艇到梁子湖南咀一带抢劫渔民的鱼。二中队队长潘斌

率部乘船与日军皮艇相遇，当即开枪打坏日军一艘皮艇，击伤日军4人，日军落荒而逃。

日军妄想在必福祠建立据点，梁湖抗日游击大队三中队深夜将修建据点的日伪军包围起来，激战一个多小时，击毙日伪军7人，夺枪8支，迫使日军放弃在这里修建据点的计划。梁子湖周边的金牛、山坡等地分别驻有日本侵略军的据点，为了切断日军的运输补给线，梁湖抗日游击大队在公路两旁设埋伏，开枪打击日本军用车，毙伤日军6人，给日本侵略军运输车以沉重打击。

梁湖抗日游击大队的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以涂家埭为立足点，扩大到了武昌县舒安、保福祠等地。当时梁子湖畔广为流传这首歌谣：

梁湖游击队，胆大有智慧。
保护老百姓，专打敌伪匪。
梁湖游击队，神兵满天飞。
渔船就是家，山林当床睡。
梁湖游击队，战场显神威。
敌人吓破胆，变成缩头龟。

革命受挫，英雄光辉耀史册

1939年6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中共湘鄂赣省委遭到严重破坏。与此同时，中共鄂南中心县委与上级失去联系。

9月，在国民党溶共、限共政策的推动下，国民党调兵遣将围攻共产党的军事武装。梁湖抗日游击大队举步维艰，几经曲折，与国民党第八游击纵队司令方步舟取得联系，方步舟同意梁湖抗日游击大队改编为其纵队下属部队。

方步舟是湖北大冶人，1926年参加当地农民运动，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反“围

剿”的军事突围期间，方步舟参与重建红军第十六师，担任师长。但因其指挥不力，造成惨重损失，被撤销职务，同时开除党籍。

1937年3月，方步舟投靠了国民党，任国民党武汉行辕参议。当年7月，方步舟回到大冶县老家，重整旧部组建抗日游击队，被国民党任命为第八游击纵队司令。从此，方步舟带着部队驻扎在鄂南及梁子湖畔等地，经常与共产党领导的梁湖抗日游击大队发生摩擦，抢占地盘，但不与梁湖抗日游击大队发生正面枪战。

自从梁湖抗日游击大队改编到方步舟的所属部队之后，整支队伍因受国民党的指令，在部队内部清除共产党员，不允许共产党员担任部队重要职务，有意缉拿一部分共产党员和有关人员。

在这种恶劣的政治环境中，梁湖抗日游击大队长王水被国民党逮捕。大队部果断作出决定，原梁湖抗日游击大队全部人员秘密脱离方步舟的部队。为了不“露红”，党组织安排副大队长王甦等人到汉江军区所属部队，其他人员分别回老家就地隐蔽，将所有的武器装备深埋在乡村一个秘密的地方。王甦于1941年初返回家乡，任新四军五师鄂南独立五团团团长。当年7月7日，不幸被日伪军逮捕，杀害于鄂城江边。

曾经抗战名声威震鄂南的梁湖抗日游击大队，历经近两年的艰苦抗日，就这样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

邓文兴，鄂州市文联原副调研员、市政协原常务副主席；杨小杰，鄂州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工作科副科长

汉阳剧场的时光流影

◇ 麻建雄

汉阳老街显正街中段，武汉解放后是汉阳的文化中心，汉阳剧场、汉阳文化馆、显正街小学都坐落在这里。这个中心，1960年代中期才移至钟家村。

汉阳剧场前，有一个蛮大的院子，院门外又是一个小广场，是街上伢们娱乐活动的天地。读小学时最热闹，逢礼拜天和节假日，这里门庭若市、热闹非凡。有打克郎球、看西洋镜、用气枪打气球的；有转糖人、拉棉花糖、扯糖稀子、卖蒸糕的；有时也有“玩打”（卖艺）耍猴变戏法的，师傅腰系板带、赤膊赤脚，舞枪弄棍、弯铁吐火。

过年时，这里更是张灯结彩人山人海，舞龙灯、采莲船、玩蚌精的也来助兴，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和硫磺味的烟雾，充满剧场两边的显正街，有点乡里赶大集的味道。

娃娃书摊不思回家

最吸引我的是租娃娃书（小人书）的小摊，它在剧场门口摆的阵式最大。好几个

摊子一溜摆开，竹床、门板上都摆满了书，每个摊子准备了很多小板凳、长板凳，供看书的伢们坐。也有“挖地老壳”“撮虾子”的，用几张废纸铺在地上，将小人书摆在上面，周边蹲着、站着看的人也不少。

我最喜欢到一位姓傅的爷爷书摊上看书。傅爷爷长得慈眉善目，长长的白胡子挂在胸前，总穿一件灰色的中式对襟上衣。他的书清一色用一张牛皮纸装订成新的封面，又用中国画白描手法涂淡彩画上插图，很吸引小伢们。

傅爷爷有张大白胡子黑白肖像照片，在汉阳青松照相馆橱窗摆了很久。现在武汉知名的漫画家“落子”就是他儿子，在市美术馆、图书馆总能看到“落子”义务帮市民画漫画肖像的身影。“落子”是我的三中学长，年轻时在汉阳公园做美工，他叫傅怀康，大家都亲切喊他“落子”老师，把他的真名倒忽略了。

我在“娃娃书”书摊上，初看到《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聊斋故事》《儒

林外史》《杨家将》和《东郭先生和狼》这些古典名著和故事，看到《狼牙山五壮士》《智取华山》《铁道游击队》《红日》《风雪大别山》和《苦菜花》这些歌颂英雄和打仗的书。也从“娃娃书”上认识了刘旦宅、刘继卣、贺友直、华三川这些著名的连环画家，并开始临摹他们的作品，“娃娃书”是我美术的启蒙老师。

坐在书摊小板凳上看娃娃书，上瘾时爱不释手，头一弯下，就顿时“埋”书里了。有时偶然抬起头来，竟发现后面还站着个看“香烟”（贪便宜）的伢。毕竟看书是要钱的，所以我们有时租看，有时也看“香烟”。那时，租一本书1分钱，都是过早攒下的钱，一次看几本还是花不少的。娃娃书很有魔力，一页一页翻动，一幅幅画卷就生动地展现在眼前，好像进入了艺术的百花园，姹紫嫣红，增知励志，总看得不思回家。

好多年后，落子告诉我，他父亲原是区防疫站的美术干部，“三年困难时期”，因身体不好经“动员”回家，这时，他祖父、祖母又相继病逝，落子兄弟姐妹六人，仅靠当医生的母亲拿工资捉襟见肘。于是，他父亲拿出珍藏多年的娃娃书，到汉阳剧场门面出租，贴补一大家。这些书都是他父亲历年在新华书店精选的，每次买两本，一本藏在箱子里，一本给伢们看。看的这一本，又把封面小心拆下来收藏，画上新封面，打上桐油，所以特别受小伢们欢迎。

到读高中的时候，娃娃书早已不能满足精神需求，我和几个同学用零用钱到钟家村新华书店，买了马列著作《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和《哥达纲领批判》。在汉阳剧场正对面的晴川巷，离那个娃娃书摊不到百米的陈杰生同学家，组织了个“马列学习小组”，每周利用下午放学的时间，一人读



汉阳剧场

一段，大家慢慢领会。

我从一个看娃娃书的伢，一下变成了一个看马列书的“积极分子”，但并领会不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那些深奥的理论，还总觉得马克思不应该把共产主义比喻成幽灵。共产主义怎么能说是幽灵呢？心里这样想，但口里不敢说，直到后来参加工作到党校学习后，才“搞清白”一点点。

电影戏剧迷人世界

汉阳剧场院子大门两边，有两块两层楼高的大幅电影广告牌。广告牌常常根据所放电影不断更换内容，一般是把设计精美的电影海报，用水粉画的形式画上去，精彩纷呈引人入胜，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

1960年代，只要上映新片，我是每部必看。特别是逢年过节，母亲会把所有新上映电影的票买全，我在票上用铅笔注明日期。大一点也和同学、邻居站在剧场门口“飞票”（买有票不看的人手中的票），那也有一种乐趣，有做一件事从努力到成功的快感。

那时，《小兵张嘎》《回民支队》《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早春二月》《青春之歌》《刘

三姐》《红珊瑚》《五朵金花》《洪湖赤卫队》和外国电影《流浪者》《雾都孤儿》《冰海沉船》《王子复仇记》非常红火，这些电影传达的价值观、人生观，也潜移默化影响着街上的伢们。

电影的插曲，都成为人们传唱的流行歌曲，我都喜欢听，也基本都会唱。不知什么原因，一直到现在，我只要一听到电影《红珊瑚》那首插曲《珊瑚颂》，“一树红花照碧海，一团火焰出水来……”就想起母亲，想起母亲当年穿着那件枣红色呢大衣的英姿倩影。

男演员王心刚、女演员王晓棠是我的偶像。1960年代初，他们与中国22位电影明星的大照片，赫然醒目地挂在每家电影院的前厅或回廊，包括我喜爱的赵丹、于洋、孙道临、陈强、崔嵬、谢芳、田华、秦怡等。

不知是谁的好点子，把明星的照片、电影剧照和插曲印成香烟盒大小的照片，让街上卖“洋画”的小摊，又多了一个品种。有的同学把黑白照片，用一种水性颜料涂成彩色，在背面写上赠言，如同明信片一样，成为同学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互赠的礼物。

母亲是小学老师，凡收到学生的这类小礼物，都会小心翼翼珍藏在一个小盒内，有时拿出来欣赏，给我们讲讲哪个学生上了大学或参加工作。这个小盒，她一直保存到离开这个世界，让我珍藏到了如今，让我



娃娃书书摊

产生了一种十分特殊的情感。那不仅蕴含了母亲与学生的情感，同时也深藏着母子情思，更是那个时代的印痕。

那时，小伢们心中也有偶像，也追星。但除了电影明星外，他们更追电影和书本中的英雄人物。当代的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古代的岳飞、花木兰、杨家将……国外的保尔·柯察金、卓娅和舒拉等。追星不仅仅是一种时髦，更多的是要成为学习和生活上的动力。那些有着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精忠报国的英雄主义精神，深深感染我们并成为榜样。一想起他们，就会让我想起那个刀光剑影的时代，想起无边旷野战马嘶鸣的场景，想起挥舞长剑冲锋陷阵的时代先驱，不由热血沸腾，永远向前，勇敢地去追逐时代的光辉。

“文革”中，“八个样板戏”搬上银幕，我们轮换看，对主要唱腔、台词、过门、开场音乐基本上滚瓜烂熟。

样板戏电影在人物刻画和塑造上，严格依循所谓“三突出”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



1960年代的电影海报

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不知是哪位“高人”，还立了个“十六字”银幕修辞规范，即“敌远我近、敌暗我明、敌小我大、敌俯我仰”。只要人物一出场，我们都可根据其站位的远近、光线的明暗、画面的大小、镜头的俯仰关系，一眼看出哪个是正面人物、哪个是反面人物。

这段时间的电影故事片，如《艳阳天》《创业》《金光大道》，尽管还没走出“三突出”的桎梏，已足以让观众一饱眼福，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直到“文革”后期，拍了一部《难忘的战斗》，才出现一位账房先生，在电影快结束时观众才看清他是个坏蛋。

有趣的是，数十年后的1988年元月，汉商集团请来田华、陈强、程之、刘琼和唐国强等新老电影明星30多人联欢，我与老演坏蛋的陈强、程之两位老艺术家坐在一起，怎么看也是两位和蔼可亲的老人。2003年11月28日，中国电影金凤凰奖颁奖典礼在武汉举行，100多名电影明星汇聚武汉杂技厅。我有幸与偶像王晓棠一起，向《回民支队》马本斋的主演里坡先生颁发了特别荣誉奖。

汉阳剧场也轮番上演戏剧，京、汉、楚、豫、越、评剧和黄梅戏，话剧和歌舞，我“巴不得”场场赶。演戏和放电影不一样，开场后，剧场侧面的出口就开了，我有时与街上的伢们“瞅眼头”找机会溜进去看点“香烟”。大家都怕碰上一个外号“瘪鸡”的守门人，他用断手甩打得小伢们很痛很痛，碰上他，伢们就像燕子飞。

儿童舞台剧《马兰花》演出数场，中小学都包场观看。“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这首质朴的童谣，是当时学生中的流行曲，大家传唱了好长时间，成为一代人



1960年代的电影歌曲卡片

的经典记忆。如今，每当回想起这首童谣的旋律，仍让我心灵悸动，好像回到了那难忘的童年。

1990年代，由于电视的普及和社会录像放映点增多，新的院线经营形式出现，传统影剧院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大部分停放电影。1983年，由于汉口民众乐园整体开发，武汉市豫剧团合并到汉阳剧场。该团每年在武汉和周边城市演出300场次左右，后因市场变化转向从事文化多种经营。汉阳剧场先后开办“阿西门”舞厅、歌厅、录像厅，十八般武艺都演了遍，后来干脆转型开起了饺子馆和儿童游泳池等，但怎么折腾都难有当年辉煌，现已拆除改作医疗机构。

汉阳剧场是两代人的记忆，当年给显正街带来活力和时尚，给予我们梦想、知识和快乐，仍然鼓舞、激励和温暖着我们。

麻建雄，武汉市摄影家协会主席，市政协第八、九届委员，汉商集团原总经理

青山有座青山矶

◇ 桂枫

武汉市青山区因“青山古镇”而得名，而青山古镇源于“青山矶”，青山矶又名“矾头山”。

矾头山位于青山镇西北的长江边，海拔62.68米，因山脚巨石延伸江中，故称。又由于此山有点形似鸡头，也有人把它叫作“鸡头山”。往来船只行驶到这里，江岸一片灰黄，山上树木翠绿，唯山独青就名“青山”了。同时，延伸江中的矾头，在水流冲击的作用下，周围出现洄流漩涡，有了“矾窝”的说法，久而久之使山下的村落也讹称为“鸡窝”了。

据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江夏县志》记载：“青山在县北三十里（武昌下游15公里），尾亘长湖，首枕长江，山下有矶曰青山矶，上有洞庭庙。”

陆游首记青山矶

在有记载的历史上，青山古镇就引得名士流连。

1574年秋天，明代进士出身的王世贞，以副都御史抚治郟阳，赴任时溯江而上。船

将行至武昌时，他发现江南岸有一小镇三面环山，古镇幽深，集市繁喧，风光秀美，人情淳朴，恍若进入人间仙境。他在“鸡窝”小镇盘桓三日，依依离去，留下一首诗：“武昌在前头，逡巡不肯去；为爱青山矶，且对青山住。”

目前所见第一个将“青山矶”载入史册的，是南宋大诗人陆游。1170年夏天一个清晨，夔州通判陆游到青山，在他的《入蜀记》中略记：“……平旦微雨，过青山矶，多碎石浅滩，晚泊白杨夹口……居民及泊舟甚多，然大抵皆军人也。”

“白杨夹口”这一渡口村落，位于长江之滨的杨桂水口一带。《大清一统志》解释说：“余家湖在县（江夏县）北十五里，其南有郭郑湖（今东湖）……白杨在县东北十五里，一名白杨湖，西北流经青山矶北入江，（水口）曰白杨浦。青山港在县北三十里，塘兵三名，浒黄镇巡检司旧驻浒黄州，今移青山港。”这告诉我们，杨桂水口之水后汇成湖，一称白杨湖，流经青山矶边入江。今天，这里还留有一座白杨桥，却被讹传为“北洋桥”了。

兵家必争青山矶

青山矶上扼武昌、汉阳，下控鄂州、黄州，紧临省城武昌，素称武昌门户，为兵家必争之地。

《水经·江水注》谓，青山矶为东吴孙权领地。东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年），东吴孙权带领水师屯扎青山镇，与刘表骁将黄祖隔江相峙。黄祖在石阳（今黄陂）武湖屯兵，以拒孙权。

据《黄陂县志》记述，南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为防北方蒙古侵扰，借长江天堑安居江南，将黄陂县寓治鄂州（武昌）青山矶。理宗元庆六年（1259年），青山镇遭受兵燹洗劫，蒙古铁蹄在忽必烈的指挥下入侵鄂州。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忽必烈率师渡淮，会师于武昌，令巴图尔驻青山矶，以阻击宋军吕文德的追击。蒙古军队从阳逻镇一带向青山镇发起渡江战役，冲破南宋舟师封锁，攻取青山镇和浒黄州。同年十月初，蒙古军队由青山矶至白浒矶一带西侵攻打江夏城，攻破城东北角，却被宋军顽强击退。这时，南宋奸相贾似道，却先后两次向忽必烈请降称臣。忽必烈因国内争权之乱，同意贾似道的请求，迅速撤回蒙古大漠。

南宋度宗咸淳七年（1274年），元朝丞相伯颜统兵20万，自襄阳沿汉水下长江攻取阳逻。这年十二月（1275年元月），蒙古大军从阳逻渡江与南宋守军大战青山矶，南宋鄂州都统程鹏飞战败负伤，撤至江夏县（今武昌区）。黄陂县所在地青山镇沦陷，又一次横遭劫掠，县城为之丘墟，顿成满目疮痍。4年后，元王朝建立，黄陂县迁回江北旧治地。

明清两代，青山矶作为江防要地，均为重兵驻守。

民国时期，先后有黔军师长杨其昌、湖北水上警察厅七艘炮舰、第五绥靖区一纵队一旅三团等多支部队驻防青山，担任江防任务。

青山矶下青山镇

青山一带是典型的移民区。因北方连年战乱，东晋南朝时，长江南北就设置了许多侨州、侨郡，安置北方来的民众。

青山矶自古即为兵防要塞，也成为长江来往船只的避风港。古镇初期为军港，而后随着商旅聚集逐渐形成“小码头”，进而发展成为辐射周边的商贸集镇。宋、元、明、清时期，青山镇跃为日用品和农产品的一方集散地，至清代走向鼎盛，成为武昌县六大市镇之一，与金口、阳逻齐名，阳逻、葛店的居民也常来这里赶集。光绪年间，古镇又辟为商市，到1938年武汉沦陷前还相当繁华。

在一条青石条路面的正街上，汇集了杂货、布匹、中西药品、日用百货和豆腐、油坊、糟坊、炒坊、煤店众多商铺。正街上十字街以酒楼、茶馆、剃头铺为主；正街中段有铁铺、棺材铺、木作坊、染行、篾店、



青山矶旧貌

磨坊、猪行、屠宰行，还有纸马铺、牌棚、鸦片馆等。据1934年统计，青山镇各业商铺和作坊已达百户左右。

青山镇的码头十分繁忙，鱼市也十分活跃。据1949年统计，青山一带水上从业的渔船有365艘之多，上市鲜鱼年约35万公斤。

来过青山镇的人们，都不会忘记张鸿兴的麻烘糕、张义茂的酥京果，更惦记各家各户自腌的臭西瓜皮。青山镇的传统手工业发达，如一套五件脚盆，更是别具一格。

时至今日，青山古镇保留着张之洞训练水军的基地遗址，还有张之洞为根治水患而建立的“武丰闸”。1913年，黎元洪重建此闸并题写“武丰闸”。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日军侵占青山镇。镇上大片民房被日军改作仓库，镇旁的满园桃树被日本兵砍光辟为马场。不过，那口乾隆年间的桃园古井，似乎还在向人们述说着历史。

爬上青山矶，登临凌空欲飞的邻鹤楼，眺望江天，环视古镇，天兴洲大桥的雄姿扑入眼帘，不禁同前人一样，陡生“回头黄鹤洲，拱手迎青山”的感慨。

展翅腾飞青山矶

历史上的青山境域变迁频繁。

西周时期为鄂国领地，周夷王十七年（前870年）一度属楚，春秋时期谓之夏汭。

秦统一中国后分楚为四郡，江夏属南郡。汉高祖六年（前201年）置江夏郡，设沙羨县，治涂口（金口）是武昌建县之始。东汉建安末年，分江夏为两部，沙羨属南江夏郡。

三国东吴黄武二年（223年），孙权筑

夏口城，是为最早的武昌城，并设武昌郡。郡治夏口城，而以沙羨属之。东晋末至陈（378—589年）设汝南县，属江夏郡，治涂口。从隋至清（589—1911年）设江夏县，治武昌。

1912年改江夏县为武昌县，属江汉道，青山境域先后为第八区、六区、五区。1935年为省试验区。日伪时期为五区。

1949年5月17日，武昌县全境解放，武昌县第二区驻青山镇。1951年12月武汉市首设青山区，1952年6月因故撤区。

1955年2月，青山区恢复，源于武钢兴建。新中国第一个大型冶金联合企业选址青山，全国10万大军在青山安营扎寨，“工人村”成为最早的工人住宅区。青山古镇的重心，开始向蒋家墩（今红钢城）转移。

随着工业建设热火朝天，一冶、461厂、471厂、省化工机械厂、青山船厂及武汉石油化工厂，相继在青山崛起。进入新世纪，天兴洲大桥和武汉火车站修建，进一步奠定了青山区重工业基地的格局。

如今，青山区在武汉的地位依然显赫，全市四大支柱产业，青山以钢铁、石化独占其二。按照武汉市发展规划，青山区树立“要金山银山，也要绿色青山”的理念，走新型工业化之路，将实现“一轴、两区、三城”的布局，即一轴——顺应和建设长江主轴，两区——宝武转型创新示范区、北湖生态文明试验区，三城——滨江红城、白玉蓝城、北湖绿城。同时，武汉地铁5号线从红钢城穿行而过，在建的19号地铁线接4号地铁线横跨严西湖。

青山矶头山的“鸡头”高高昂起，似乎要插上翅膀腾飞江天。

桂枫，《青山文史》原编辑

在城市“修补”中自我完善

◇ 董菲

人物名片：董菲，市政协委员，市规划研究院国际所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民进武汉市委会副主委。

我在学生时代的研究方向是历史城市及建筑修复，无论是城市价值体系挖掘，还是历史建筑的修缮、历史景观的空间塑造都要求做到“真实性”和“完整性”。这六个字，看似很简单，但当我真正从事城市规划工作后，方觉好说不好做，因为对任何事物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追求，需要持续不断的认知追问和实践探索循环，永无止境。

2017年，我成为武汉市政协委员，在对政协委员的职责深感荣幸的同时，更多的是担心难负使命。因此，我常常告诫自己，建言时一定要求真务实，多提专业的点子、有用的点子。由于研究领域和从事工作的原

因，我对城市建设领域，尤其是历史文化空间的保护与活化较为关注。

政协发声 学会协商解难

2017年，市委市政府提出长江主轴、长江新城等重大战略，把武汉的空间发展框架引向以长江为核心的向心发展，当时很多委员、代表都在热议长江新区应该选址于何处。基于多年工作积累，我发现武汉从历史到当代的城市发展轨迹一直在长江两岸跳跃扩张，因江而兴、与江相搏、江城共融已成为烙印在武汉城市血液中的基因。因此我认为，在经历高速发展的40年后，我们开发新区的同时，也更应关注存量空间的文化弘扬和有机更新。在当年政协大会市长见面会上，我提出以“生态修复、城市修补”为



2021年政协大会上发言

重要抓手建设长江主轴的建议。这个建议当即得到大会的重视，会后又专门在市委政协协商会上进行了深入讨论，并由规划局、建委、房产局、园林局拿出具体工作方案。这一系列的做法让我第一次感受到政协委员的责任和担当。

此后，通过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专委会组织的一号议案建设历史之城的调研活动，我走访各区采集数据和城建计划信息，集合了七个中心城区在历史街区环境整治、历史建筑改造、老字号产业的现状问题、利用困难和经验总结，取长补短，完成了历史之城建设的调研报告，在政协专题协商会上进行交流。

通过提案办理和交流，我更加清晰理解了城市建设中各环节所涉及的各项工 作，也更深刻了解到其中的难点和问题，比如：历史权属复杂导致项目前期难以统一，保护经费不足只能先保安全、拆改建比例失衡难

以筹足资金、运营策划后置导致刚建好又要改、多部门建设计划分置导致扰民等矛盾相互咬合，老百姓中拆迁意愿不一致……这促使我在本职工作中更系统全面地看待规划项目，从全流程、全覆盖、全要素地提出策划运营先行，空间落地保障，主次行动分期等思路，更细腻地换位思考建设主体和受众面的想法和需求。

2019年，我了解到百姓对菜市场的环境问题意见颇大，社区、环卫、水务等部门应对频繁的投诉疲惫不堪，于是，我把当年建言的方向定位于“菜市场环境的整治和改善”。

以农贸菜市场为核心的街区是社区中最有活力和人情味的场所，但熙熙攘攘的人群却只能穿梭在常有油污水和烂菜叶的街道上，尤其是夏天蚊蝇飞舞，更让人糟心。在走访十几家菜市场后，我对标先进城市经验，建议通过垃圾分类、生物处理器、户式隔油池等系列小措施对湿垃圾和油污排放进行源头减量处理，期望能通过小措施起到大成效。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农贸菜市场迅速“跃升”为疾控重点防范的场所。时任省委书记应勇要求将菜市场环境改造列为重建计划的重点抓手之一，武汉市政府为此联合十多个管理部门成立专项工作小组，拨付经费全面改造中心城区菜市场。我的提案也因此被列为市政府督办件，市商务局、市场环境监督局、城管委作为主办单位各负其责，从初期制定改造标准、到中期建设和后期验收，都与我定期联系，邀请我分别参观菜市场1.0版、2.0版、3.0版建成效果，还对湿垃圾“大户”饮食街、居民小区做了外延式装备和试点管理。多部门合作到一个点上，效果大大超出了预期。

眼见着身边菜市场不仅灯明地净，设

置了老幼休息区、社区活动室，还建立了从鲜菜采购流程、农药检测到顾客反馈的智慧设施，让我对疫情后城市卫生环境综合治理效能大竖拇指。为此，在当年世界规划师大会上我专门撰稿演讲《新时代更强韧的社区治理——以武汉农贸菜市场改造为例》宣传超大城市治理的经验，获得广泛点赞。

巡街走巷 打磨城市角落

我始终认为规划师不仅是描绘蓝图，也属于百匠之一，作品需要“手工打磨”。尤其是超大城市，文化多元、人口众多，很多生动的细节才能构筑美好生活的方方面面。这需要在城市治理、专业技术和公众间架设桥梁，而政协能够充分发挥平台优势，汇聚更多力量。

2018年，我路过汉口沿江风貌区合作路附近，感叹刚维修改造后的老街老建筑韵味十足，很多达到文物修复的标准。但又“吹毛求疵”地发现临街建筑的电线电缆盘根错节、随风飘散，不仅影响风貌，还有消防隐患。现场询问施工队为何不整理，原来审批项目中没有包含管线工程。于是立马撰写《关于统筹历史街道景观工程建设的建议》报市政协。没几天这个小建议竟然被市委书记签批，经市建设局、市房管局和区政府协商，将管线工程和安防系统增补进了工程目录，同时被市房产局纳入项目验收和全市老旧房屋改造工程标准。两个月后，我走进清爽整洁的街巷，切实感受到好工程不仅要“面子”，还得有“里子”。

五年来，我作为政协委员和区人大代表，主动担任所属辖区江岸区车站街的社区规划师，一直进行伴随式服务。无论是美丽街区改造，还是街道环境整治，抑或是红

色物业覆盖，每每街道遇到物质性改造，都会通知我去现场出谋划策。

每年我都会找一些突出问题进行专题调研，由此形成巡街走巷的习惯。2016年为片区整体发展，我提出利用老城区便利生活条件引进创新社区概念，创建青年人才公寓以改善片区人口结构，提升活力的建议；2017年为老里分腾迁提出就地就近集中换房安置不愿搬迁的原住户，同时可以保留旧城烟火气的建议；2018年调研列为万里茶道三大遗迹之一的大智门火车站站房，建议改造成京汉铁路历史陈列馆；2019年调研天生街菜市场环境和交通治理；2020年提出收购闲置用房改造为平时储备物资仓库、战时隔离点等特殊用途。

虽然这些建议未能全面实施，但得到区政府及相关单位的重视，有些方面的工作得以改善。如将大智门火车站站房改造为博物馆的建议，权属单位地铁集团和文物管理部门都觉得尚缺乏条件，但是也可以梳理近



2020年调研菜市场湿垃圾处理

代铁路起源、万里茶道故事做宣传栏向慕名而来的公众展示。同时，对我提出的文保建筑周边杂树树枝撬动了窗户和屋面结构造成面层破坏、漏水等问题，他们不仅修补了损坏的房屋，修剪了树枝，还承诺以后每年都会定期检查这些隐患。工作细碎，也许成效并不显眼，但我却很有成就感，仿佛为一位老人做了体检，配了常备药，即便不能焕发青春，也能延年益寿。

诸如此类的大城小事，很多时候是在工作调研或者生活中偶然发现的，如在汉阳古城亮点片中提出汉阳树根系（500年银杏树）和元妙井（城内唯一古井）水脉保护，新泰茶厂老厂房残墙保留并作为万里茶道遗迹展示，利用兰陵路街头绿地隐藏电力箱柜，警察博物馆周边历史建筑的考察认定，德林公寓（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共中央领导人居住地）的历年招牌清洗等，一桩桩城市角落中发现的小问题都转化为小建议提交上去。很庆幸大部分建议都能得到不同程度地解决，同时也让更多的公众了解和热爱身边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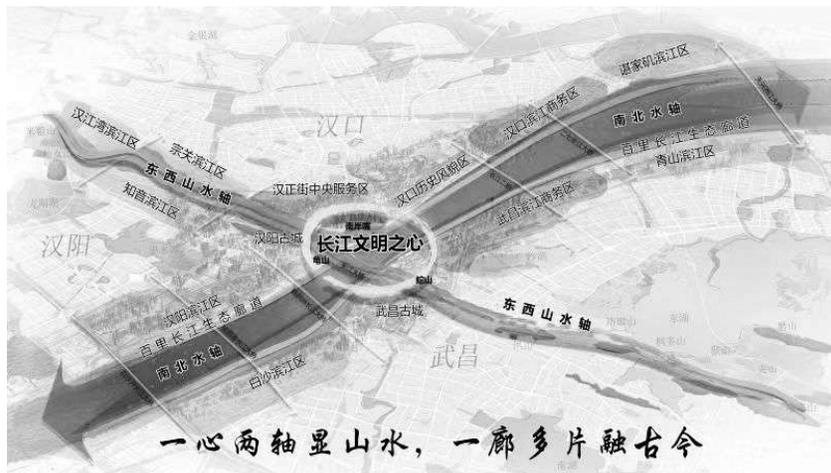
2020年，建设百里长江生态廊道调研

凝神铸魂 与城市共生长

曾经听一位老政协委员传授履职经验，他连续两届任期内提同一件提案，虽然由于各种原因不能解决，但依旧热情不减，每年他都抽空再调研一番，调整一下实施建议，期待未来能有机会实现。五年来，我一直以这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激励自己，着眼城市建设，持续关注感兴趣的专题，同时也把握了协商的方法，那就是多听意见，换位思考，才能达成共识。有些建议可以马上采纳速见成效，但有些建议还需要培育社会环境，等待时日实现。

2020年，武汉刚刚战胜史无前例的新冠肺炎疫情，又面对百年来长江流域性大洪水。武汉面对洪水的经验可谓丰富，当年4月就提前部署抗洪的物资与调度，还超前提出汛期后百里长江生态廊道建设计划。同年，我国第一部流域性法典《长江保护法》即将颁布，我在民进市委协助下组建水环境、生态、地质、文化、法律等专家调研组，就长江在武汉段的水安全、水生态、水文化、水滩城结合发展等主要方面的问题、对策进行研究。随后，主笔撰写集体提案《以建设武汉百里长江生态廊道为契机全面打造世界滨水生态名城》，获得市委的高度重视，立即签批到市政府及水务局等部门研究。紧接着我在年初的市政协大会上做了《建设万里长江最美岸线》的大会发言。

2021年该提案被列为市政协重点提案，并纳入市领导



两江四岸整体规划（武汉市规划研究院提供）

帮包的重点项目。民主监督和献计献策都需深度参与其中，我在水务部门同志的带领下走遍了境内 284 公里的长江岸线和 112 公里的汉江两岸。长江气势磅礴和汉江蜿蜒秀美相得益彰，除了耳熟能详的江汉朝宗和龟蛇锁大江等典故外，境内铁板洲、白沙洲、天兴洲三大沙洲各领风骚，禹公矶、槐山矶、青山矶诉说着不同的历史经历，武丰闸、武泰闸、金水闸和诸多现代排水泵站共同守候着一城安然和富饶……

丰富的长江水工遗产不仅代表了人类对大自然的驾驭能力，更体现了长江经济带自古以来的生命力，但却因其延续至今的功能往往被公众忽略其文化性。梳理长江文化遗迹，讲好长江故事的想法油然而生。时值国家文化公园系列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独创的精神文化品牌，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却没有列入，两会呼声此起彼伏。武汉作为长江中游的核心城市先行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示范区，既有责任也有优势。我带头撰写了集体提案《积极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武汉先行示范区的建议》，面对这一宏大题材，从空间概念、工作机制、机构组织、建设项目和产业培育等多个方

面畅想了未来 5-10 年的目标。2022 年元月 3 日中央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领导小组即宣布启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可谓是对我们一年多的提前谋划以最大鼓舞。

仅有建设构想和目标，没有实干抓手就会沦为空谈。结合在建的武汉百里长江生态廊道和历史文化名城亮点片区的重要

节点，我撰写了《擦亮武汉封面区，加快推进江汉关阳台建设》提案。江汉关是武汉的城市标志之一，许多重要的仪式活动和大型民众活动都选择在此进行。但多年来不仅江滩步道在此断开，道路也在此弯折，重大活动也往往展不开“手脚”。为此我从航运史和开埠史、经济活力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等多角度阐释江汉关阳台建设的意义、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升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示范区核心节点高度提请省市领导重视，解决多年悬而未决的腾迁等问题。尽管我也深知推进该工作极其不易，一份建议力量有限，但呼声越多汇聚的力量就越大。

每座历史名城都有着复杂的过去，也同时期待多彩的未来。生于斯长于斯，城市这巨大的母体正如奔涌向前的长江一样生生不息，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政协生活让微小的个体体会到城市文化容量的自我修正过程，也锻炼了个体韧性和自省能力，凝神铸魂，保留个性，推陈出新，吸收不同文化，自成独特魅力！

脚踏泥土 利他致远

◇ 刘 鹤

人物名片：刘鹤，武汉市新洲区政协委员、高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1975年，我出生于武汉新洲。这里，浩浩汤汤的长江奔腾不息，蜿蜒曲折的举水涓涓流淌，巍巍大别山层峦叠翠，浩渺涨渡湖碧波荡漾。孔子曾使子路在此问津，问津文化传承千年。如果说青山绿水，赋予了这片土地别样的灵韵，那么厚重底蕴，则滋养着一代代新洲人。生于斯长于斯，我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在心里，更在行动上。

峥嵘岁月中初心如磐

我的父亲是白手起家，他凭着一把砌刀闯天下，从建筑工人做起，经过多年的奋斗在建筑市场取得一席之地。从小他就教育我做人要真诚，做事要认真，简单朴实的话语，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踏入社会，他告诉我，一勤天下无难事，在外不能丢了新洲

人脸。工地上，我扛砖挑沙，砌墙抹灰，从普通工人到管理者再到公司掌舵人，脚踏泥土一步步走来，我体味了劳动的苦，也懂得了奋斗的甜。

在2007年以前，公司在父亲的经营下已初具规模，建筑劳务也开展顺利。但是，粗放式的管理模式、一把锤子、一把镰刀的包工头式发展已成为过去式，要想企业能够长期、快速、健康稳定发展，企业转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迫在眉睫。

2007年，在我的主导下高品建设有限公司正式成立。2013年，公司进一步有了重大变革，顺利完成集团公司组织架构的整合，成立高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新成立董事局，我成为董事长。集团公司下设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高品混凝土搅拌站、高品建材有限公司，建立起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层各负其责、协调运转的良好机制，在经营管理上更加规范，现代企业体制已具雏形。

公司紧抓住市场机遇，适应市场需求，业务稳步成长，取得了良好的发展业绩，实现了公司规模与效益的同步增长。先后在新洲、武汉、湖北、新疆、河北、山西、安徽、福建、云南等地开发项目达 1000 多个。2015 年 5 月 20 日对于我来讲是个特殊的日子，公司迎来乔迁之喜，从被誉为中国建筑之乡之称的武汉市新洲区，搬迁到具有“中国第一商业街”之称的武汉市楚河汉街，向外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也意味着自己肩上的责任更加重了。

在我眼里，没有工程大小之分，只有质量优劣之别，做一个工程，打造一座丰碑。每一个工程，从负责人到工人各岗位职责明晰，通过制度管理环环相扣，大家自觉用行动遵守“优质、安全、文明”的要求。正是始终谨守质量和安全的企业生命线，将质量管理与创建优质工程相结合，将安全管理和创建文明工地相结合，企业的口碑越来越好，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

从世纪城商住楼到汉口北领袖城商住楼，企业承建的 1000 多栋工程，合格率达到 100%；公司先后承建的“航天科工 068 基地”、“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动物实验楼”、“庙山大花山社区”、“阳逻武阳大道”等大型工程，优质率工程 95%。获得湖北省楚天杯和武汉地区黄鹤杯、文明样板示范工地等多项奖，连续五年被湖北省授予“建筑百强企业”、“先进建筑企业”、武汉市“先进建筑企业”、“安全生产先进单位”、“武汉地区建筑业 AAA 级信誉企业”、武汉市“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等。公司现有职工 1000 多人，其中各类技术人员 462 人，年均安排农村劳动力 1.2 万人就业。

建好房子，办好企业，让员工和周边村民过上好日子，这就是我最初的追求。

平凡日子里默默奉献

有一个小故事很打动我：

一个盲人在走夜路的时候，手里总会提着一盏明亮的灯笼，人们对此十分好奇地问道：“你自己又看不见，为什么还要提着灯笼走路呢？”盲人回答：“我提着灯笼，既为别人照亮了道路，别人也容易看到我，不会撞到我。这样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保护了我自己。”

极致的利他，就是最好的利己。在出资助学、扶贫济困、救灾助残、捐款修路等事上我从不含糊。

我的慈善之行起源于一次爱心行动，记得是 2003 年，到偏远山区看望了一群孤寡老人后，我心里特别难受。老吾老及人之老，我想着一定要为他们做点事，于是拿出 50 万元对他们进行定向资助。

2016 年 2 月 6 日，在长江网上看到新洲“卖菜叔”甘书清 14 年一个人撑起一个家，23 年如一日照顾瘫痪在床的妻子，供一双儿女上大学，14 年竟没有吃一顿团年饭。为此，我专程从新洲赶到道观河风景区集贸市场，邀请“菜叔”一家吃团年饭，圆了他们的团年梦。

新洲邾城街女子缪海英离婚后患重度尿毒症，婆婆摆摊前夫打工为其筹钱治病，5 年多来花费 50 多万元。我深感母子俩这 5 年来的不容易，当即给她们送去 1 万元。

2007 年以来，新洲区每年在“七一”前后，都会启动“不让一名贫困大学生失学”的捐资助学活动，我总是率先积极响应。2007 年集团全体员工共捐赠 55.45 万元，2008 年捐赠 72.64 万元，2009 年捐赠 89.32 万元，2010 年捐赠 50 万元，2011 年



刘鹤在新疆的项目工地上

捐赠 188.8 万元，2012 年捐赠 198.8 万元，2013 年捐赠 208 万元，2014 年捐赠 158 万元，2015 年捐赠 208 万元……数字是冰冷的，但我的心是赤诚的。

2020 年伊始，当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家家户户正沉浸在团聚的喜悦和幸福中，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悄然来临。新冠肺炎病毒以惊人的速度在武汉蔓延，成为全国疫情的风暴中心。我和哥哥刘松向武汉市新洲区慈善会捐款 100 万元，希望为战疫贡献一份力量。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高品建设集团临危受命。2 月 3 日晚间，我接到新洲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电话，按新洲区新型肺炎疫情发展需求及区政府工作安排，高品建设集团受命改造“新洲区新型肺炎疫情医学观察点（技校点）”项目。我担任项目负责人，连夜组织人员、组建项目部，当晚项目技术人员进入现场勘察，组织施工设计，安排材料、设备进场。操作过程中可谓困难重重，出于对病毒的恐慌，工人怕感染

不愿意去工地，我只能挨家挨户去做思想工作。因封控管理物流不畅，材料供给也需环环协调，一度电话打到发热关机。该项目施工总面积约 1.3 万平方米，改造大小 208 间房间，高峰期施工人员超过 200 人，经过 8 天昼夜施工，最终圆满完成任务交付使用。

就在刚刚完成了新洲区新型肺炎疫情医学观察点（技校点）”项目后，大家还来不及喘口气歇息一下，2 月 17 日，又接到区政府命令，立即转战阳逻开发区，在阳逻长江物港工业园火速建成一个占地约 10000 多平方米，拥有 1000 多个床位的方舱医院。还是由我担任项目负责人，带领施工人员吃住在疫情防控建设一线，历经 6 天的昼夜施工，胜利完成任务。参与隔离区和方舱医院建设的全体员工在建设任务完工后，自觉居家隔离 14 天，多数员工因为建设任务超过一个月没有见到亲人。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在慈善之路上，在大考的淬炼中，我看到了帮扶的力量，看到了个体的坚韧，战胜自我，超越自我，最终源于自我。

使命召唤下勇攀高峰

2021 年我当选新洲区政协常委，同时任新洲区新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会长。这些职务是荣誉，更是责任。

通过学政策，到实地，想办法，找途径，我不断提升自己的参政能力，发挥委员“智囊”作用。2021 年，经过充分调研，我就民企发展、交通建设、乡村振兴、城市建设等提出了五个建议。

企业兴则武汉兴，企业强则武汉强，民营经济是武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体之一。作为民营企业中的一员，我对其发展处

境深有感触。从走访调研情况看，当前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潜意识里对民营企业另眼相看，把民企看作带电的“高压线”，不敢碰、不愿碰，更别谈为民营企业家的权利鼓与呼了，导致了市场出现不公平竞争。很多民企是家族企业，运行大多靠亲情，“人治”色彩浓厚，以人情代替制度，缺乏科学有效的治理机制。民企抗风险能力弱，特别是经历疫情后，很多民企举步维艰。

企业好经济就好，居民有就业、政府有税收、金融有依托、社会有保障。我所在的新洲，大约有8万多家市场主体。我从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搭建畅通有序的政企沟通平台、建立有效落地的服务机制、破解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四个方面进行建言。希望推动相关部门在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给予中小企业更多支持。

新洲是建筑之乡，民营建筑企业占有一定比重。推动建筑民企快速转型发展十分紧迫，从专业的角度，我建议支持开展横向收购兼并、纵向链条整合、股权战略重组，引导龙头企业从传统的施工总承包向投资设计、开发施工、运营维护、生产制造等全产业链延伸。

2020年10月，新洲红色旅游公路二期全线完工通车，途经道观河风景旅游区和徐古街，全长27.52公里。它不仅肩负新洲区推进东北部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的重任，还是打通东北部山区乡村振兴发展的一条“致富路”，是体现新洲红色旅游景点特色的一条生态公路。

大路修好了，但交通配套仍是问题。目前公交规划路线都只到达东北部地区各集镇中心，并不通往乡村旅游集聚区，村名无法乘坐便捷、便宜的公共交通去往乡村旅游集聚区域。为此我提出了《延伸公交线路

至红色旅游公路二期，打通乡村旅游公共交通瓶颈》的建议。

在做慈善的过程中我走访了很多家庭，发现失能失智老年人群的照护问题，已成为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瘫痪在床不能自理、大小便失禁、24小时需要照料……护理一位失能老人，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说，都意味着巨大的身心压力，长期照料失能老人严重影响家庭生活，对一般家庭都是难以承受的负担。

捐款捐物无法解决根本问题，政协委员这一身份给了我深层思考和建言解决社会问题的机会。我提出《完善失能老人养老模式，回应民生关切》建议，从着力构建制度架构、运作机制、管理办法，完善配套设施建设，探索失能老人照护模式，营造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氛围，解决这一痛点问题。

新联会会员来自全区各行各业，共有75名会员，以民营企业 and 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经营业主、自由职业人员居多。作为新联会会长，我积极发挥组织作用，引导企业和经营者在做大做强自身的同时，实现资源、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的优势互补，联动发展。我着力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送爱心、结对子、进社区、访乡村……搭建互通桥梁。抗洪救灾、抗击疫情、脱贫攻坚、社会帮扶，每场战役，每个特殊时期，都有会员活跃的身影，不是充当志愿者值守一线，就是忙碌于捐款捐物保障后勤。服务社会，服务发展，新联会凸显着新作为新力量。

我出生于农村，我成长于工地，我穿梭于百姓间。我不懂高深的理论，但坚信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利他，方能致远！

1957，初见大师陈伯华

◇ 俞啟凤

“三八”妇女节早上，好友与学生在微信里发来祝福，大多是“女神节快乐”。看到“女神”两个字，便想：谁能担当起这两个字呢？脑海中，即刻想起了我的老师——汉剧艺术大师陈伯华，她是我心中永远的“女神”。

当年京昆大师俞振飞先生这样评价陈伯华：“京剧两百年出了个梅兰芳，汉剧三百年出了个陈伯华”。讲汉剧，首先要讲陈伯华，她在几十年的舞台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将汉剧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可以说，陈伯华是中国汉剧艺术的骄傲，也是武汉市的一张名片。

“这是我们这次招的宝贝？”

我1957年考入武汉市汉剧团（武汉汉剧院前身）训练班，是新中国建立剧团后招

收的第一批学员。

剧团对招收第一批学员非常重视，首先由前辈艺术家集体讨论，选出一班负责招生考核的老师，他们既要有高超的表演技艺，又特别善于教学授徒。在大家心中，招到了学员，汉剧就有了接班人，就有了希望。因此，老师们认真负责，严格挑选，经过初试、复试、终试，再加文化考核，从近4000名考生中，最后定下来我们28个学员。

训练班设在清芬剧场三楼，有练功房、文化教室和宿舍，食堂在一楼剧场售票处拐角。从第一天上课起，除了担任教学的老师外，每天都有剧团的其他老师，在上班点名之前来三楼看看我们再去上班，对我们寄予厚望。不久，我们便知道了二位著名汉剧大师——吴天保和陈伯华。吴天保我们见到了，他是常来三楼看看的老师之一，但什么时候能见到陈伯华老师呢？

我们听说，从招生到上课这段时间，陈伯华老师率领汉剧一团在外地巡演。直到一天下楼吃饭，看到剧场和售票处的宣传广告、演出预告，才知道一团要回来了。想看戏，想看陈伯华老师的戏，心里很激动。

那天早上练完功，训练班老师通知我们，去汉口火车站迎接一团归来。我们穿戴整齐，早早就去了火车站，我和同学李介仁（著名演员“大和尚”李春森的孙子）手捧着花，目不眨眼望着车站内，等啊等啊……

一声响亮的汽笛声后，训练班主任夏之雄老师说到了，领着我们进入车站，看到陈伯华老师一行从站台徐徐走出。她穿着一件淡绿色碎花旗袍，面带微笑下来，慢慢走近我们……哇，好美啊！我手捧着花呆呆地看着她，忘记了到车站来的目的，直到时老师喊着我的名字提醒“快把花献上呀”，我才缓过神来，快步上前把花献上。她俯身下来，拥抱了我和李介仁，问夏主任“这是我们这次招的宝贝？”听到夏主任说是的，她开心地笑了，连着说好的好的……那一刻，我永远记下了第一次见到她的情景。她的美，她的笑容，她亲切的声音，60多年过去了，永远留在了我的脑海中。

“凤，你来摸一下”

食堂在一楼清芬三路那边，我们每天去吃饭，都会绕过售票处。从一团回来那天起，售票处门口便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有时排到滋美食品厂门市部前，甚至远到铜人像。有的观众为了买到好座位，半夜就来到售票处，等到早上8点半开门——当年陈伯华老师的戏一票难求，是我们亲眼所见。

那一段时间，也是我们最快乐的日子，

可以经常观摩老师们的演出了。剧场天天满座，我们28个孩子任意找位置看戏，音乐室、灯光室、二楼楼梯上、舞台两侧，凡可站立的地方，都有我们的身影。剧场工作人员、乐队和舞美老师，从不嫌弃我们这群毛孩子。在他们看来，我们是汉剧的子孙，是汉剧的希望，是汉剧的未来。

在汉剧的鼎盛时期进入汉剧训练班，我们观摩了汉剧最优秀的一批老艺术家的演出，目睹他们精湛的艺术表演，感受他们质朴的敬业精神，我们这一班学员，实在是幸运。

陈伯华老师的美，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里，更多展现在艺术表演中。只要当天有戏，她是一整天不说话的，尽量用手势。当手势实在表达不清楚时，她才会近距离用“悄悄话”交流，声音很轻很轻，只为晚上



1985年，陈伯华由作者陪同赴山西运城，参加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兰从艺45周年紀念活动后留影

演出有充分的体力，有悦耳的嗓音，以不负观众、不负爱她的戏迷朋友。

戏曲界有一句行话“饱打饿唱”，陈伯华老师每逢演出，是从不吃晚饭的。午饭后休息一小时，起来洗个脸，下午4点钟以前必到剧场。走进后台二楼的化妆间，她马上一丝不苟开始化妆，一切全部完成，最少三个半小时到拉开大幕。有人偷偷数过，她的一边眉毛，至少要画300多下。她在化妆上的严苛，成就了她的每一个角色，在舞台上都近乎完美。

戏曲女演员练功排戏非常辛苦，但更痛苦的一关，便是化妆中的提头吊眉，松了会没有神采，紧了会天旋地转，乃至恶心呕

吐。陈伯华老师的化妆师徐福林，近一米八的个子，又高又胖，给她提头吊眉时连勒带拉咯咯响，我在一旁都吓得直哆嗦。可陈伯华老师从不含糊，也从未见过她晕吐。有一次演完戏，她卸下勒头带说：“凤，你来摸一下。”我用手一摸，耳后有一圈凹下去了，我的食指都能放进去，吓得赶紧把手缩回。想想自己第一次初上舞台提头吊眉，吐过，哭过，甚至想过放弃。

“感激他们对我的爱”

那个年代，看老师们的戏，是我们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刻。虽然我们还是懵懵懂懂的，但让我们一步步入门，一步步走进汉剧。

当时，武汉汉剧院是全国优秀剧院之一，汉剧行当“一末到十杂”，每个行当都有很优秀的艺术家，他们都有自己的拿手戏和绝活。一末胡桂林的苍劲，五丑李罗克的诙谐，六外周天栋的洒脱，七小王晓楼的儒雅，九夫童金钟的慈祥……表演艺术各有风采，给予观众精神上的享受，也给汉剧留下了一批优秀的剧目。

陈伯华老师的每一出戏，无论是《贵妃醉酒》的内白“摆驾”，还是《二度梅》的踩着小锣声轻盈上场，都会



1981年10月，汉剧《徐九经升官记》在湖北剧场演出后，陈伯华（二排中左）、著名汉剧艺术家万盏灯（二排中右）同演员合影，作者饰李倩娘（前排中）



1957年，汉剧团少先队中队（即训练班学员）同老师在中山公园合影，前排左一为作者

引来观众热烈的掌声，好一阵才停下来。训练班老师告诉我们，这叫“碰头彩”，只有在艺术上有一定造诣，深受观众喜爱的演员才能获得。

我们班28个人，年龄10—15岁，初识汉剧不懂戏，连唱腔、表演、身段都还未入门，每当一阵阵掌声响起来，都不明白为什么。我只觉得，陈伯华老师太美了，每一次出场，靓丽闪亮的头饰、雍容华美的扮相、婀娜多姿的身段，就像是画上的仙女款款走来。

陈伯华老师的戏一定是压轴的，从没有观众提前退场，聚精会神欣赏她的表演，如痴如醉品味她的唱腔。还有的观众，就是为了一睹芳容，直至整场演出结束。

散场时，训练班老师都会提前满剧场找我们，要我们快快回三楼洗漱睡觉，明天早上还要练功哩。可我们哪里舍得离开，

还有更精彩的谢幕呢！经久不息的掌声，迎来陈伯华老师每场三四次的谢幕。她不管多累，都会面带微笑，心存感激，轻盈地走向台中，深深地鞠躬。前两次是例行向一楼和楼上观众致谢，第三次会用水袖绕花作出半蹲舞姿，顷刻全场就沸腾了。

陈伯华老师用她精湛的艺术，征服了热爱汉剧的观众；而观众也以尊重艺术的态度，给予了她发自心田的褒奖。我后来问过她：“您谢幕那么多次，心里一定很高兴吧！”她说：“高兴是次要的，主要是回报喜爱我的戏的观众，感激他们对我的爱……”

这句话，让我牢牢记在心里，也一辈子尊重艺术，尊重热爱艺术的观众。我从11岁考入训练班习青衣花旦，先后师承著名汉剧演员夏中侠、刘金凤和陈伯华大师，又到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深造。在舞台工作20余年后，调入武汉市艺术学校，担任京、汉、楚三科表演理论、戏剧史及汉剧专业课的教学，从不懈怠。退休以来，不忘传承陈伯华老师的德和艺，热衷业余戏曲团队的教学辅导。如今我已75岁了，仍在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等高校奔波，心甘情愿播撒传统戏曲的种子。

几十年过去了，我常常回忆与陈伯华老师在一起的日子，她为汉剧而生，汉剧因她而精彩。

俞启凤，武汉市艺术学校退休教师

从“插座大王”到“豆芽大王”

◇ 余建栋（口述） 许濛（整理）

人物名片：余建栋，湖北玉如意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市宁波商会监事长，第十二届武汉市政协委员，第四届武汉新洲区政协常委。

1994年，23岁的我准备到武汉创业。朋友们很惊讶，“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他们印象中的湖北人是很霸道很滑头的。附近的上海、杭州都可以去，何必去那不熟悉人又“恶”的地方。而我自有我的想法。熙熙攘攘汉正街，萋萋芳草鹦鹉洲，语文课本上武汉的美好深深吸引着我。武汉九省通衢、高校众多，商业氛围浓厚，于个人而言发展机会相对较多。怀揣对未来的憧憬，我道别父母，坐上客车，一路颠簸，风尘仆仆，来到了陌生的武汉。

引入优质插座挺进武汉

一天我无意间路过汉口前进五路，发现一幢欧式历史建筑的墙上有一块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的铭牌，上面赫然写着“汉口宁波会馆旧址”。对着碑文我了解到这是1924年建成的武汉宁波同乡会的会所，通过查阅书籍我了解到“宁波帮”在武汉的贡

献和声誉。沈祝三为建武汉大学信守合同，不惜倾家荡产；汉口沿江大道的欧式建筑，基本出自宁波建筑商之手；武汉建设的全国最早的发电厂、最早的自来水厂、最早的火柴厂，都是“宁波帮”作为发起人和大股东……我为同乡人而骄傲，也立志像在武汉的宁波前辈一样，干出一番事业。

转过一条街来到前进四路，这里是汉口电子市场一条街，很多店铺在销售产自宁波的移动插座。通过跟老板的交流得知移动插座在这里的市场销量非常大，但头疼的是质量不好，存在退换货较多和用电安全隐患等问题。我忽然想到，插座正是我老家的优势产品，如果能找到注重质量的供应厂家合作，我就能在武汉站稳脚跟了。我定下心来，联系老家质量相对较好的厂家发货，进商场签柜台、租仓库，找寻潜在的客户关系，开启了武汉的创业之路。

因我为人本分，做事公道，客户很愿意跟我打交道，业务不断扩大，但问题也接踵而来。我经销的虽不是三无产品，但也不是最优秀的产品，同质化的价格竞争越来越激烈，很多生产厂家因为手续不齐全进驻不了武汉的正规商场。我意识到，好质量加上好品牌才是公司发展的出路。

1996年春节，我回宁波慈溪老家，在慈溪遇到公牛集团的董事长阮立平。当时他们兄弟俩刚成立公牛电器厂，专门生产移动插座，只有三五间厂房，规模还像个小作坊，但阮立平的远见卓识和为人处事让我折服。在国家有关政策的大背景下，移动插座市场乱象终将由乱转治，这个企业“要做用不坏”的插座，做的插座“要保护电器、保护人”，公司的经营理念我非常认同。我果断签约，并马上注册自己的公司，成了公牛牌移动插座湖北地区总代理。

果然，公牛品牌在阮立平董事长的带领下，很快成为国内高档开关插座转换器行业的佼佼者。但是，公牛插座刚出来时并不好卖，它比普通插座贵两倍以上，原来的批发渠道打不开，几个月下来销售寥寥。我对公牛品牌的质量充分信任，分析问题所在，决定在销售渠道上做文章。

20世纪90年代中叶，武商集团所属的武汉广场，连续多年全国商业单店销售额第一，是武汉商业销售的引擎、品牌销售的风向标，它对产品质量及售后意识极强。我意识到，公牛牌插座质量优异，只要武汉广场能进货，其他商场都会“跟风”。

我使出浑身解数，叩开了武汉广场的大门。不过两月，公牛牌插座进驻了全市所有商场。之后，因为信任大商场的选择，一些小经销商和消费者到批发市场寻找公牛插座，就这样倒逼武汉几个电子批发市场的一些大户，从原来不敢进货到主动要求进货，各地市县的客户也纷纷来人来电话进货。公牛销售网络在武汉乃至湖北地区逐渐铺开。如今，公牛销售量达到湖北地区移动插座市场65%以上，牢牢占据“湖北第一”的位子，我也因此被圈内称为“插座大王”。

带着放心豆芽走上餐桌

2007年开始，已迅速发展壮大的宁波公牛集团公司，将原来省级代理逐步降格为市级或县级代理。作为公牛公司的老代理商，我能理解公牛公司的做法，这样销售渠道实行扁平化，精耕细作，让渠道下沉，使产品更接近消费者，同时便于厂家对市场的管控，可防御竞争对手渗透。但我建的渠道日后都会变成上游厂家的渠道，失去渠道也就失去了做代理商的价值。看到这种趋势后，爱折腾的我在想是否能学习公牛创建一个品牌一个属于自己的渠道呢？

恰逢2007年，武汉市有个别黑作坊生产有毒有害的“药水豆芽”流向市场，相关报道引起武汉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为保障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专门成立武汉市放心豆制品领导小组，组织调查研究，出台相关政策。其中，要求扶持培育8至10家日均投料10吨以上的大型骨干豆制品加工企业（含豆芽）、规范升级10家特色豆制品加工企业（含豆芽）。

这则消息让我看到了商机。由于豆芽是武汉市民餐桌上十分喜爱的农产品，在整治的同时必须培植大的豆芽生产企业，实行标准化生产，产品监督有源可查。但豆芽生产利润不大，且投资金很高，风险也很大，一般企业不愿涉足。我经过一个星期的昼夜市场调查，了解到武汉市场豆芽每天有200吨左右的容量，销售额全年在1.5亿元以上，如包括200公里内可辐射到的周边城市，全年销售额应在2.5亿元以上。真可谓，小豆芽大产业，小豆芽大民生。

了解了市场容量，我又观察了一些小作坊豆芽的制作销售现状，为了高产、不烂

好看，多少都会添加一些违规的药品，作坊主在生产中普遍患上皮肤病、关节炎。我意识到生产工业化发展是条新路，工厂智能化生产豆芽完全有别于农田作业。我经过对市场分析和外地学习考察，决定投资豆芽工厂智能化生产项目。

对于投资农业，每一个经商的人心中都很清楚，它的投资回报周期长，依靠规模化和全产业链整合才能做出经济效益，但真正有实力的农企并不多。大部分农业企业产业链相对单一，财务风险比较大，如果没有优秀的管理能力和强大的资本作保障，农业投资很容易陷入困境。获准成为政府扶持培育的对象之后，2007年11月湖北省玉如意绿色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从创建之日起，公司就定性为一家专注于各类芽苗菜研发、生产、深加工、生物制品萃取及技术培训成果转让的科技型企业。只有科技兴农才能走出投资农业的困境，只有发展现代科技农业才符合未来发展道路。

我投资6000万元，在新洲区汪集工业园建成了一家全国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工厂智能化豆芽生产企业，日产芽菜200吨的智能化生产线于2009年8月正式投产。

豆芽对温度、湿度、水质以及保存环境等要求非常高，豆芽烂和豆芽脆是困扰规模化生产的两大技术难题。为了攻克难题，我查阅大量资料，请教专家和豆芽师傅，并和武汉华中农业大学、武汉轻工大学、武汉农科院开展校企、院企合作。我同公司技术骨干扎根车间，吃喝睡都在厂里，模拟豆芽自然生长环境、采用不同产地豆子进行了上百次试验，最后掌握了不同环境下豆芽的生产规律，摸索出一套促使豆芽高产高品的生产、清洗方法。同时，在我和团队的不断实践中，公司收获了2项发明专利、8项实用

专利，对企业增加效益起到了推动作用。

为丰富产品，满足市场需要，公司不断研发新的芽苗菜产品：黑豆芽、青豆芽、豌豆苗、花生芽、五彩豆芽等产品，以供不同人群选择。

为了让消费者放心食用我们精心生产的豆芽，并有别于小作坊的豆芽，我给豆芽上了“身份证”，在工厂建立产品追溯系统，让消费者扫二维码便知道豆芽的生产过程。每个销售网点都有产品的流通许可证。包装袋上明确印有“不添加催生素，不用漂白粉荧光增白剂漂洗”等字样。为了确保质量，公司在东北建有专门的原料生产基地，坚持豆芽7天自然生长期，用自打的地下井水淋水等，各环节质量以严格的程序控制。

我注册了“玉如意”牌商标。玉代表冰清玉洁，代表品质，如意是豆芽的形状，同时也是吉祥之意，整体寓意就是高品质的豆芽给予消费者吉祥如意的生活。

领着小作坊踏上发展新赛道

有市场就有竞争，但玉如意牌豆芽上市竞争的激烈程度，仍让我始料未及。由于模拟自然生产，生产周期比市面上添加生长激素的豆芽长，产量也要低很多，因而玉如意豆芽批发价格要比同行高0.1元至0.2元，价格处于劣势，导致上市时每天只有十几吨的销量，每天出产的200吨豆芽根本卖不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烂掉。

开公司建工厂，你可以在国家法律、政策许可下任性地开始，但市场未必领你的情、买你的账。在全套仿生态封闭环境、智能化作业的生产车间里，我看着自己和生产团队研究孵化出来的黄豆芽、绿豆芽万分着急。因为这种生产周期七天、保质期只有

三天的娇嫩豆芽，它的市场还散落在各地小作坊商手中。面对生产得出却销售不掉的窘境，我心急如焚。

为开拓市场，我将市场划分为三块，采取切香肠战略一节节攻破。首先是市区两级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其次是市场上各大中型超市，最后是小作坊商供应的菜市场和零散的小超市。在市政府“放心豆制品”工程的支持下，玉如意牌豆芽很快进入机关单位和超市，但是难就难在小作坊商供应的集贸市场。

小作坊商生产的豆芽虽然食品安全问题频出，屡遭消费者诟病，但这是作坊业主赖以生存的来源，他们绝不会自动放弃。我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在攻克这块市场时，我并没有借市政府文件的规定，采取简单粗暴的打压政策。这样只会导致恶性价格竞争，质量没保证，使消费者和生产者两败俱伤，这是不明智的。我们采取一个互惠双赢的政策。所谓互惠双赢政策，就是步步为营，与小作坊商一个一个谈，将他们转变为玉如意的代理商。也就是说玉如意以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价格成为供应商，他们维持自己的市场不变，只是不用再自己生产豆芽，而是从玉如意进货。

一方面，玉如意有量产的能力，可以充足供应市场需求；另一方面他们可以在减少时间、精力和劳动力投入的基础上，获得和以前自产自销相当甚至更多的收益。人工小作坊需要人和水、添加剂长期打交道，关节炎和皮肤病成了他们的职业病。加之拖家带口，牵绊着一家几口劳动力。从这种意义上讲，他们的收益是增加的。

找到问题症结，我迅速出拳。收编武汉豆芽市场上约200家小作坊，我组织公司经营团队一家一家找上门，劝其停止作坊式

生产豆芽，承诺按照市场价收购其原料和生产场所，并将其吸收转化为“玉如意”的经销商，实现合作双赢。

但步步为营的面谈也并非一呼百应，甚至出现个别小作坊商合作一段时间后又自己生产，个别小作坊商先在玉如意大量赊货然后逃之夭夭等违约情况。收购全市小作坊商的过程，耗费了公司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以至于投产三年后营收才逐渐持平。前期基本上是在困境中硬着头皮迎难而上。

经过整编，玉如意共收编了全市150多家小作坊。这种统一监管加工销售某种农产品的模式，在湖北省也是首创。当时，武汉的超市、菜场里70%左右的豆芽都出自玉如意农业集团。大家又给了我一个“豆芽大王”的新绰号。从“插座大王”到“豆芽大王”，爱折腾的我从未停歇。

豆芽营养丰富，适合各种配菜。但豆芽保质期短、利润低是痛点，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和销售半径。公司每年以不低于产值的6%作为研发费用，从开始的筐装、盒装发展到现在的第三代活体豆芽，提高了保鲜时间和销售半径问题。组织研发人员开发出了豆芽凉拌菜、豆芽速烹菜、即食豆芽等预制菜，以此为契机，公司延伸出了火锅食材，肉糕、蟠龙菜、黄陂三鲜、粉蒸肉、香辣螺蛳、香辣毛豆、卤水花生等一系列的餐饮、家庭食材。近些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倾向于简洁、方便的烹饪方式，而玉如意预制菜依托完善的物流基地、成熟的冷链运输能力和强有力的品牌效应，让消费者吃得放心与安心，布局预制菜，无疑为企业找到了另一条壮大发展之路。

踏准节奏追梦大健康

◇ 沈献礼

人物名片：沈献礼，武汉万松堂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随州商会常务副会长，武汉市医药行业协会、随州市食品行业协会副会长。

踏准互联网节奏，亮出老烟枪

我出生于传统中医世家，祖籍是有着炎帝神农故里之称的湖北随州，从小便阅读了《神农本草经》等大量中医经典古籍，特别是“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的传奇记载深深影响着自己。因此，大学我选择了中医药专业，大学毕业后选择了在家乡自主创业，创业也一直围绕着医药与健康方向。

1996年，在第一个创业项目总经销代理的一款戒烟产品获得人生第一桶金后，我就有了自己的想法，就是要做自己的产品，把家中老父亲常说的一张戒烟秘方转化成戒烟产品！拿到了秘方，我就开始了艰辛的研发之路，请教中医学院的专家教授、上千次的试验，到各大药店门市调研，开模具试生产，最终于1999年产品研制成功。“老烟枪”戒烟液问世了。

以为有了前面戒烟产品成功的营销推广经验，“老烟枪”戒烟液很快就能大卖。但事与愿违，3个月过去了，招商广告花费了5万元左右，一个客户都没谈成。望着毫无生机的工厂和员工失望的神情，是继续借钱投广告还是关厂，我人生第一次面临两难抉择。

2000年当国内企业还在热衷于投放传统广告、布局线下渠道时，我隐约预见到互联网这一新生事物的发展潜力，决定尝试互联网招商。当时，我连电脑都没有摸过，许多员工连字还不会打，我便果断贷款8万元，购置了十台电脑，聘请专业老师，组织大家一起学习电脑操作。从苦练五笔打字，到学习网络推广知识和电商营销技巧坚持了2个月，我从一个电脑门外汉，迅速成为熟练掌握网站策划、网络推广、SEO优化、贴吧论坛、信息发布等知识，能灵活运用互联网营销技巧的实战达人。公司因此幸运地享受到了中国第一波互联网经济红利，引发了让传统营销模式难以想像的市场裂变，产品订单呈几何级爆发增长，“老烟枪”戒烟液迅速引爆市场，同时申报获得配方与制备方法的发明专利。

踏准工业化产业发展节奏，推出解酒茶

“老烟枪”戒烟液大单品的成功，更坚定了我对健康产业的信心。我随即联想到，烟酒不分家、酒茶不分家，为何不再做一款具有解酒功能的茶产品呢？说干就干，我立即组织团队查阅古籍古方，主打养肝护肝功能，以本地野生葛根为主要原料，依靠自己的中医知识，按照君臣佐使原则反复配伍药食同源的草本原料，研发推出一款“陪酒师”解酒茶，并找到当地一家茶厂委托生产。有了互联网营销的加持，2002年12月“陪酒师”解酒茶上市便引来一波持续的销售高潮，也催生了中国代用茶新品类的发展。

“陪酒师”解酒茶的再次成功，让我看到了中医养生文化的博大精深，看到了药食同源和新资源原料的丰富价值，看到了将千年茶道与中医养生进行创新融合的巨大市场与商机。因此，我又做出一项重大决定，筹资1亿元，征地100亩建厂，投资兴建两条10万级和30万级GMP标准净化生产线。于2005年初建成拥有先进成套的设备设施、生产流水线、技术实验室、检验化实验室，具有原材料筛选、清洗、晒法干燥、破壁粉碎、萃取提纯、科学配比、混合搅拌、数字化制粒、热风循环干燥、紫外线杀菌、滤纸无菌内袋铝箔外袋全自动小袋一次成型、质量检



万松堂集团随州生产研发基地

测、装盒装箱入库等先进生产工艺，国内首家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的养生茶生产基地，月产能可达1.8亿袋，将古老养生文明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以工业化产业发展，夯实做强做大养生保健茶产业的基础。

踏准中部崛起节奏，进军大武汉

现代化的养生茶生产线建成后，由于产品单一，企业知名度不高，销量远远无法满足现有产能，大量的产能出现闲置。我深深意识到人是很难赚到认知以外的钱的，正所谓思路决定出路，格局决定结局，老板本人就是企业发展的天花板。为了不断抬高自己天花板，让自己的思维与知识不落后于时代，让万松堂能够在我的带领下持续健康发展下去，我报读了武汉大学EMBA。

企业要想长久发展，一定要做好战略规划，一定要有强大的品牌。这时一个更大的目标在我心中萌发，那就是把清末民初祖上在江城万松园老街里的一家名为万松堂的古老养生茶铺，传承并发扬光大，把万松堂的品牌叫响，形成“北有同仁堂，南有万松堂”的市场分布格局。

2005年，我正式进入武汉，在江岸区成立武汉万松堂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依托武汉九省通衢的地理优势、高校林立的教育资源，组建研发中心、营销中心，打造万松堂主品牌。武汉的战略布局非常成功，新品研发速度、市场推广速度呈加速发展态势。从2006年开始，公司陆续研发生产出具有平衡三高、养肝护肝、清咽润肺、消食健胃、滋阴养肾、降酸降糖、利尿排石、排毒养颜、祛湿健脾、纤身瘦体等十几大系列一百多款万松堂牌养生保健茶，并为同仁堂、修正、仁和、三九、白云山、葵花、九州通等多家

知名大品牌提供专业化定制服务，养生茶生产基地的产能得到充分释放和利用。

2011年，作为在汉的随州创业者，我参加了随州在汉企业家们的“联谊会”，此时便萌生了建立一个组织来凝聚随州企业家在汉力量的想法。此后我多次积极主动参与武汉随州商会筹备的策划与推进工作，参与了《武汉随州商会章程》《武汉随州商会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办法》等文件的起草工作。2016年5月，武汉随州商会正式成立，我本人也荣幸当选为商会常务副会长。我还承担着商会产品推广服务等职责，以服务会员企业的新品推介和产品推广为主线，加强信息资讯沟通，整合内外部资源，创新服务理念思维，全面提升会员单位产品知名度和品牌美誉度，不断提升武汉随州商会对内的凝聚力、对外的社会影响力。

有了武汉随州商会的发展推动，结合自身业务发展需要，2016年我又在武汉东西湖区投资1亿元，投建了6层建筑面积共6000平方米的研发、营销大楼，以及涵盖固体饮料、方便食品、膏滋、压片糖果、特膳食品、保健食品等功能食品及中药饮片数条10万级净化标准生产线，大健康产品线进一步丰富，年产值过亿元。

经过十几年发展，万松堂形成了强大的产品研发力、生产制造力、品质保障力、运营推广力、定制服务力、品牌文化力。先后获得多品类的生产许可、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证明、美国FDA认证、HACCP食品安全生产认证；相继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省支柱产业细分领域隐形冠军培育企业、两化融合示范企业、两型社会建设和循环经济发展节能企业等认定。

踏准跨境电商节奏，走向国际化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我认为观海方知天地宽，观世界方有世界观。在布局国内产业链的同时，我便将目光瞄向国外，出游发达国家，参观优秀企业，参加国际会展，在开阔眼界的同时，更加坚定了“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认知，也坚定了推进发展万松堂海外事业的信心。

为了在公司营造一种国际化的氛围，我带头背单词、讲英语，学习国际贸易规则，掌握跨境电商技巧，每年分批将生产经营管理骨干送到国外参观学习。以国际化思维、全球化视野布局“一带一路”，申请万松堂国际商标（WinsTown）注册，目前美国、澳大利亚、南非、日本、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商标注册证已齐备；通过阿里国际站、各跨境电商平台、海外代理等方式，万松堂牌养生保健茶、功能食品远销欧美、中东、非洲及东南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额达5000万元以上。万松堂用国际化语言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国悠久的养生文化和健康理念，让东方养生智慧传播海外。

踏准新媒体发展节奏，盘转万松堂

一个好的品牌除了具有物质属性外，还要具有精神属性，具有精神属性的品牌，更能携带强大势能抢占受众的碎片时间，并且把品牌的人格符号植入人们的心智。万松堂自成立以来，品牌的物质属性一直追求绿色健康、品质安全与匠工精品；品牌的精神属性追求梦想情怀、使命担当，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成为一个有温度、有情

怀，具有强大势能的人格品牌。

自从接触互联网后，我始终对新生事物保持天然的敏感度，对各类新媒体品牌推广也都是先行先试。从 QQ 到微信，从博客到微博，从朋友圈、公众号到视频号、抖音短视频、直播，始终保持与时代同频。特别是今年我克服普通话不标准、镜头前表现不自然等短板，用了 3 个月时间坚持发布了 60 多个反映万松堂品牌及自己工作生活日常的短视频，抖音粉丝量快速上升到 1.5 万，有力促进了万松堂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忠诚度。

在做好企业的经营发展的同时，我还积极投身公益事业，比如汶川地震捐赠价值 50 万元财物；向家乡洛阳镇东外环路建设捐款 14 万元；每年向对口扶贫帮困村捐助爱心财物 3 万元以上；2020 年疫情，我拿出 30 万元现金捐给万松堂在全国的布点城市武汉、广州的随州商会和随州红十字会，还向随州市高新区医院捐赠价值 22.3 万元的救灾车辆，向武汉、随州等地社区、卫生院捐献生活物资达 10 万元，还将在曾都区洛阳镇的一栋 3000 平方米的厂房提供给洛阳镇政府用作防疫隔离点；2021 年 8 月，面对家乡均川镇、何店镇特大洪灾，捐赠抗洪救灾生活物资 5 万元，极大提升了万松堂的企业品牌和社会形象。

踏准资本裂变节奏，布局大健康产业

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进入新时代，面对消费升级大趋势，作为大健康企业，为消费者提供健康安全的产品与解决方案，也将是我们不懈的努力与追求。

当前，大健康产业已进入快速发展的

黄金机遇期，国家的“健康中国”战略为大健康产业描绘了宏大蓝图；《湖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将大健康产业纳入万亿级支柱产业规划；《湖北省大健康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具体明确到“十四五”期末，全省大健康产业总规模达到 12000 亿元，湖北成为国际知名的大健康产业聚集区和健康消费全国性中心，武汉成为引领国家医学发展、国内最为重要的 3 大国家医学中心和国家生物经济先行示范区的总目标。

历经 20 余年的发展，万松堂已经完成大健康产业的战略布局，发展成为多领域布局、多产业融合、多业态发展的大健康产业集团。进入新时代的新发展阶段，万松堂将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抓住历史机遇，锚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细分领域隐形冠军总目标，坚持功能两极化、品类多元化、品牌矩阵化、运营资本化发展战略，对现有产品进行功能细分、场景重构和品类拓展：

一是沿着重功能的保健、特膳、特医、OTC 方向，不断提升科研硬实力，提升产品高度；二是沿着轻功能的食物化、快消化、高频化、年轻化方向，不断提升市场创新活力，提升产品宽度；三是洞察消费新趋势，进一步拓展品类，细分市场，构建场景，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厚度；四是加快跨境电商外贸发展，不断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五是以资本为纽带，携手全球事业伙伴合作共赢，推进大健康产业融合，构建大健康产业生态，形成大健康产业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高质量发展的新发展格局，奋力迈进 IPO 上市企业之列，为人类健康事业的进步和发展，奉献万松堂的智慧哲学和使命担当。

武汉老会馆大起底

◇ 万建辉

清末到民国，来武汉三镇经商的外地商人行帮，先后设立 349 所会馆公所，其中汉口 208 座、汉阳 49 座、武昌 92 座。除此之外，1921 年后新增同乡会 24 座、同业公会 71 座。

2021 年以来，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赵逵，带领研究团队，通过查阅海内外历史地图和文献档案，深入三镇老城区实地调研，发现晚清民国时期，汉口已是全国商业会馆最多的都市，武汉三镇会馆不同时期的累计总量更为惊人。

依据赵逵教授的研究成果，3 月 23 日到 3 月 26 日，笔者随武汉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办公室顾问王汗吾，前往汉口前进五路、大董家巷片区、汉正街大夹街，探访所剩不多的老会馆旧址和建筑遗存。

老会馆来自全国 17 个省

武汉三镇涵盖省城、府城、商业市镇三种不同性质，武汉老会馆涵盖工商行帮会

馆、同乡仕宦会馆、士子会馆及军人会馆。会馆跨越了清代与民国两个时期，既包含传统的会馆公所，也包含近代改称或转变而来的同乡会、同业公会。

武汉工商行帮会馆数量在全国称第一，超过了同期的商业大都会上海、天津、广州。以科举士子聚集形成的士子会馆，则是故都北京最多。

武汉自古便是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早就是盐、茶、粮等大宗商品的重要集散地。1861 年汉口开埠，多国租界带来海外贸易，汉口成为国际商港，海外物资经汉口辐射国内 17 个省。清末民初，京汉、粤汉铁路相继通车，武汉交通枢纽地位更为凸显，崛起为新型贸易中心，吸引各地商品汇聚，商帮、手工帮及其他行帮应运而生。

商帮经营的商品多具地方特色，形成各自的优势行业。晋商经营票号，控制茶叶等与俄国的贸易；徽商长于典当和盐、米、木、棉花、药材的经营；湖南、江西是码头运输的大帮，山东帮主要输入棉纱、棉布、胶布、

会馆往往与同籍官绅来往密切，在衙门林立的武昌，会馆与同籍名宦专祠构成“会馆—专祠”组合。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淮军、湘军等地方军系崛起，又催生出军人会馆，与同籍会馆构成“会馆—昭忠祠”组合。同时，会馆常被衙门征用，或承办重要政治活动。

会馆担当城市部分民政职能。会馆兴建的厝所、义冢，解决了同籍商旅的安葬问题，甚至部分会馆本身即专司或兼任厝所。会馆兴建的义冢，多选址交通便利、地势高爽的山腰，以同乡组团的形式，在汉阳城西聚集分布。

会馆承担城市部分消防职能。汉口会馆兴建“水龙”“火巷”，水龙局编制完备、设备先进，大多紧邻会馆设置，与会馆兴建的火巷配套防灾。同时，会馆高大的墙垣，为灾害或战乱中的难民提供了一处庇护所。

从会馆建筑布局、建筑风格等层面看，不同程度体现出原乡性的传承、地域性的演变、商业化的发展。由此，南来北往的建筑文化，与三镇本土文化融合碰撞，形成一些独特的建筑意匠。

汉口的会馆建筑高大，以其华美的人文景观，与城市沿街、滨江、滨湖乃至山地景观相结合，构成城市天际线的时候，丰富了城市景观的层次。不少会馆的园林



江苏会馆

面积不大，但在布局、建筑、理水、掇山、植绿、借景等方面有着独到设计，以“五亩之园”承载故乡的文化基因，丰富了三镇的园林形态。

由于清末辛亥兵燹，汉口会馆遭到重大损毁，重建的刚需与传统会馆的火灾隐患，促进了会馆建筑风格的近代化转型，也推动了城市建筑文化的发展。

四座会馆遗存大董家巷

汉口大董家巷片区，位于大兴路与民权路交汇之处，眼下正在实施旧城改造，这里有平江会馆、匹头公会会所、长郡会馆、太平会馆的旧址遗存。

大董家巷17号，平江会馆的西式三层楼房，门窗破损，二楼窗户搭建严重，但灰黑色的建筑外立面保存基本完整，西式门窗券拱、爱奥尼立柱、装饰腰线等保持原状。

平江会馆也称平江商业公会，1896年由湖南平江销售纸、茶、油、麻的商人捐资兴建，专为平江商业同人集会之所。1909年落成，1911年毁于兵燹，1919年重建，距今103年。

平江会馆，是外地县级商业会馆在武汉留存的唯一标本，也与中国革命的重大事件有联系。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夫人杨开慧寄给毛泽东的信件，由大董家巷湖南同济布庄，设法秘密转到井冈山。杨开慧牺牲后，也是由同济布庄出面收敛遗体安葬。

1927年5月湖南发生许克祥“马日事变”，中共平江县委书记陈景潜“跑反”到武汉，落脚于此避难。

1931年，为打破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贸易局，通过汉口

平江商业公会，出口茶油茶叶，同时运进食盐粮食，改善苏区经济状况。

离平江会馆不远，匹头公会会所位于二盛巷，尽管墙面电线乱如蛛网，但西式廊柱、拱券、罗马柱仍彰显建筑的结实与奢华。它是纺纱企业联合会的会所，是汉口纺织、布匹企业主和商人聚会的场所。

在大董家巷，王汗吾指点两处灰黑色墙头，说是长郡会馆残留的一堵墙，墙头依稀可见精美石雕，墙面尚存“溯湘”二字。长郡会馆是湖南帮的聚会议事场所，建造于清道光年间。1877年的《湖北汉口镇街道图》，在现址标注有“长郡公所”。1930年代的长郡会馆照片上，还留有完整的门楼。

大董家巷靠近花楼街一侧，找到太平会馆旧址。因会馆四周均有建筑物，从巷子抬头望去只能见到屋檐。屋檐呈层叠状，具有西式建筑的特征。建筑上端改变较大，四面墙体保存完整，一些老砖上有“太平会馆”铭文。会馆大厅有一座4米高的石库门，为武汉近代建筑中所未见。在花楼街一侧进门处，尚有30多米长的石板路甬道，是不可多得老汉口印记。

太平会馆由徽商集资建成，原址1860年毁于大火。1877年的《湖北汉口镇街道图》，在现址标注有“太平公所”。它占地面积约1821平方米，是汉口历史上仅次于山陕会馆、江西会馆、徽州会馆（3馆均不存）的大型会馆。太平会馆若能修缮，将是雄伟壮观的汉口近代会馆建筑的代表。

宁波会馆曾经风云际会

紧邻江汉路的前进五路，有两栋气派的西式建筑面北耸立，墙面均有“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标牌，它们便是目前保存最完



宁波会馆

好的两座老会馆——宁波会馆和江苏会馆旧址。

两栋房子气势雄伟，“长相”几乎一样：新古典主义风格，立面对称布局，三四楼之间檐口凸出，没有人为破坏和搭盖痕迹。

宁波商帮在汉口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明清时期便形成了势力庞大的“宁波帮”，主要经营建筑、搪瓷、粮食、布匹、染料、木材等。《汉口宁波帮》记载，宁波帮在汉所充当的主要是国内土特产与洋货贸易的中转角色，并经营汉口至沿海的货运。

汉口开埠之后，已在上海占据主导地位的宁波商人，得长江航运之便迅速做大。他们为汉口这座新兴商埠搞水电、办实业、建学校、开银行。武汉近代建筑中，江汉关、汇丰银行、景明洋行、汉口总商会、汉口水塔、南洋大楼、武汉大学等著名建筑，大部分为宁波帮所造。

清康熙六年（1667年），宁波商人在循礼坊横堤堤外，建起了江浙绸公所（又名三元殿），作为同乡同业团拜议事之所。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又在汉口九如桥创建浙宁公所，宣统元年改名宁波会馆。后续宁波商人，还在汉口建了宁波里和四明会馆。

出生于宁波鄞县的沈祝三，1904年被上海协盛营造厂派往汉口主持施工。1908年他在汉口开办了自己的营造厂——汉协盛营造厂。武汉三镇的300多座著名建筑中，有建筑商可考的107处，其中56处为汉协盛所建造，最负盛名的是武汉大学早期建筑群。

宁波会馆还是一个“红色之地”。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占武昌城，湖北省总工会在宁波会馆举行成立大会。这次大会选举向忠发为委员长，在武汉下设武昌、汉阳、硚口三个办事处，并陆续向各县派出特派员，指导推动各地发动工人运动，建立工会组织。李立三、郭沫若等均出席会议并发表了讲话。

北伐军攻克武汉之后，在南昌的蒋介石意识到，如果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可能将不受其指挥。为探听虚实，1927年1月，

蒋介石从南昌来到武汉，不接受任何安排，不自设驻地，而是住进宁波会馆。他以同乡身份联络感情，与江浙地区工商界重要人物会面，试图制造影响。其间，他在汉口宁波同乡会恳亲大会上发表演讲，宴请各界代表竭力劝说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成员同意他的意见，把国民政府迁往南昌，但却无一应和，只得悻悻离开汉口。

1927年1月21日，“工人运动讲习所速成班”在宁波会馆开学，刘少奇、李立三、董必武、项英、张国焘等均在此授课，学员多达90余人。抗战时期，宁波会馆曾收容过不少难民。

宁波会馆还是红领巾小学的前身。1912年，宁波会馆主事盛竹书、唐爱陆创办“宁波旅汉小学”，校址位于德华里，后改名私立汉口宁波小学，随宁波会馆搬迁至此。

新安书院毁于清军纵火

在汉正街繁华地段大夹街附近，一面老得发黑的墙体延绵40余米，如果不是墙上钉有“优秀历史建筑”椭圆形标牌，很难联想它是新安书院，建于1668年，至今已经354年。

新安书院是徽商议事的公所和停棺寄厝之所，也称徽州会馆。1694年，徽商买下一个名为“余大霭”的房子，次年动工兴建书院，建筑采用徽州家乡书院祠堂的规制。建筑工匠从徽州家乡招募，大青砖也在徽州烧制（砖上烧有“新安书院”正草隶篆各体铭文），木材、石料也大部分从徽州购买用船运到汉口。花了12年时间，



匹头公会会所



平江会馆



长郡会馆墙体



太平会馆墙体屋檐

终于建成了规模宏大的新安书院。此后，陆续在书院和周边建了御书楼、文昌阁、玉皇殿、新安巷，还设置了救火水龙。

由于书院供奉有康熙皇帝亲笔御书的“朱予六言诗”御碑，历代湖广总督、湖北巡抚、藩台、臬台、学台及汉阳知府、知县等大小官员，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武昌、汉阳坐船过汉口，到新安书院御书楼，拜谒康熙皇帝的御笔碑，并给书院学生讲学。

1775年，“复开康衢以通商旅，并置房屋十余椽，取给租赁，以足春秋二祀之需。”新安书院修了新安街道，与新街相接，不仅新街“京苏洋广”百货纷呈，新安街也成为药材、参燕、百货等大商店行栈的集中地，两条街总称为新安市场。“京苏洋广巧安排，错彩盘金色色佳。夹道高檐相对出，整齐第一是新街。”叶调元的一首《汉口竹枝词》，形象地描绘了商业繁盛的新街街景。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派兵镇压。黄兴亲自到汉口督战，与清军发生激战。冯国璋在汉口放火，大片民房化为焦土。新安书院、新街及新码头一带，也成为一片废墟。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汉正街小商品市场恢复，新街辟为服装市场，新安书院旧址前开始人流如潮，繁华景象得以再现。

老会馆保护刻不容缓

因战争破坏、经济转型、城市建设等原因，拥有349所会馆的武汉，如今仅剩宁波会馆、江苏会馆、匹头公会会所、平江会



武汉文史专家王汗吾介绍新安书院老墙

馆、太平会馆、长郡会馆等建筑旧址，而新安书院、万寿宫（江西会馆）各自只有一堵墙的遗存。除了宁波会馆、江苏会馆保存完整，其他老旧不堪，损坏严重。

武汉老会馆保护刻不容缓，尽管采取了一定措施，在园博园汉口里恢复了汉口山陕会馆的戏楼，但整体保护现状不容乐观。建筑风貌的损毁及病理性损害，都严重威胁着会馆的续存，一不小心它们就会消失在拆迁进程之中。

老会馆的利用未来可期，应加快对建筑遗存的甄别、挂牌、风貌整治、专业测绘及数字化存档。专家建议：以功能置换，开展会馆文化体验；以会馆复原，带动文商协同发展；以会馆文脉数据库，助力城市规划及文旅一体发展。

王建辉，长江日报主任记者

汉口江滩一期工程回顾

◇ 吴世纬

今年，汉口江滩防洪及环境综合整治（一期）工程，已竣工开放 20 年了，作为当年工程建设责任人，不由回顾其进程，留下一段城市建设的片断。

势在必行

汉口江滩综合整治（一期）工程，上起武汉客运港，下至粤汉码头，长 1.04 公里。其间，有企事业单位 58 家，各类建筑物面积 9.6 万平方米，住户 301 户，常住人口 1100 人。居民社会成分复杂，很多盲流、拾荒者窝住其间，垃圾荒草成堆，混乱不堪。

同时，由于历史原因，滩地上既有解放前遗留下来的货栈、库房，也有解放后建造的结构颇为牢固的仓库、车间和船厂，还有改革开放后建造的饭店、娱乐城、网球场、游泳池。此外，另有用油毡板壁搭盖的简陋民居。所有建筑基本上没有正规

报建手续，导致滩地上建筑杂乱无章，乱搭乱盖现象严重。

因此，无论是从防洪角度，还是与江滩紧邻的旧租界历史建筑群景观对照，都是格格不入。随着武汉市创建山水园林城市和环境创新的深入推进，汉口江滩综合整治势在必行。

定位明确

国务院“关于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明确要求：要将武汉建设成为“具有滨江滨湖城市特色的现代城市”。1998 年“武汉市建设山水园林城市综合规划”进一步要求：结合江滩整治，布局休憩设施，建设观光亲水平台及绿化休闲区，形成滨江大绿带。

根据“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以及“汉口江滩规划可行性研究”，汉口江滩定位

于汉口主城核心区的大型滨水区，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依照防洪治导线，适当吹填平整，总体控制高程在吴淞 28.8 米左右江滩地上（1999 年武汉关水位为 28.89 米）。

这样，汉口江滩将建设成为以大面积绿化和滨江公共活动空间为主，与沿江金融贸易区功能有机结合的“绿色亲水平台，夜色水景观岸线，休闲文化乐园”。

2000 年 12 月，在市政府的委托下，长江勘测设计研究院完成了“汉口江滩防洪综合治理工程研究报告”，长江科学院完成了汉口江滩政治方案的水工模型试验，武汉大学完成了数学模型计算。根据模型试验和专题研究，通过拆除江滩阻水建筑物、疏浚河道、吹填，整理江滩、护砌岸坡等措施，可有效提高河道的防洪能力。

2001 年元月，市政府邀请包括院士在内的 20 余位国内知名专家进行咨询。专家认为，对汉口江滩进行以防洪及环境为主的综合整治，是正确且必要的，此举体现了人与自然协调的治水新思路，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2001 年 5 月，“可行性研究报告”正式批复。

2002 年 2 月 20 日，市政府办公厅发出通知：为加强对汉口江滩防洪及环境综合整治（一期）工程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市政府决定成立领导小组，组长为副市长涂勇，我作为成员并兼任办公室副主任，具体组织实施，实为工程责任人。



1998 年洪水漫上滨江公园

施工顺利

工程上起武汉客运港，下至粤汉码头，全长 1.04 公里，平均宽度 160 米，高程 28.8 米，总面积 16 万平方米，总体上形成“三区”——观江游览区、中心广场区和休闲活动区，“三带”——滨江亲水带、游憩林荫带、堤防观景带。

——吹填工程。在搬迁了 58 家企事业单位，拆除各类建筑物 9.8 万平方米后，按照长江委批复的要求，利用长江的泥沙（达到疏浚河道的目的），对低洼不一的滩地进行了吹填，使高程达到 28.8 米，并覆盖 50 厘米的种植土，形成大型滨江吹填平台。

——亲水平台工程。根据长江水位随季节变化的特点，将工程分为三级平台：一级平台是冬季亲水平台，高程 20 米，宽度 10 米，采用混凝土台面；二级平台为春、秋季亲水平台，高程 25 米（我市防汛设防水位），宽度 30 米，采用块石铺装台面；三级平台则是夏季亲水平台，高程 28.8 米，宽度为 8—10 米，采用天然石材铺装。每级平台以 1:3 坡比相连，同时二三级平台均有

大面积绿化，设有不阻水休闲设施，配以灯光、音响等，形成水景岸线。

——林荫游憩带工程。林荫游憩带长1040米，宽160米，是汉口江滩的主体，以绿色为主。沿着园林小路走，沿途有树、有景、有座椅、有商亭、有小品雕塑、有饮水机等。其中一条宽4米的林荫小路，模拟长江流向，蜿蜒穿行于绿色之中。林荫游憩带栽种了各类乔灌木70多种，其中乔木4331株、灌木23万株，草坪达6万平方米。总体形成“八片”（银杏、竹林、枇杷、桂花、雪松、樟树、广玉兰、乌柏）“两带”（樟树带、桂花树带）。同时，利用空间的起伏，合理点缀趣味小品雕塑，联系沿线串珠状的观江平台、群众健身场、露天广场、中心广场、水上乐园等，形成一条横贯滩地的流线型散步活动。

——堤防观景带工程。将原有的单一防汛功能的防水坪，按照把“防汛当产业抓”的思路，改造成厢式防水坪，形成防水坪高台步道，堤防垂直绿化、缓坡绿化为一体的堤防观景带。人们在高程31.5米的防水坪高台步道上游憩的同时，可远观长江、近看江滩全貌和堤内历史建筑群。防水坪高台步道上，配有造型简洁具有时代感的灯具，加上优美的音乐，突出新世纪的时代风格。厢式防水坪还可多种经营，开设餐馆、茶社等，提供简易适用的休闲服务。

——配套工程。为体现有利防洪、以人为本、以绿为主的特色，并使功能趋于完备，其配套工程的合理设计是极其重要的。道路设置，

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以满足不同类型人群的通行为前提。给排水系统设置，既考虑雨水排放，又要考虑游憩需求，同时还考虑绿化等用水。供电项目，在确保线路安全可靠的前提下考虑空间景观，线路一律采用电缆方式入地敷设；供电能力则以既满足江滩各类用电需求，并适当留有余地为原则。电信项目，电话亭的设置以市民的方便为本。服务实施项目，按小型、分散、轻灵透明、不影响防洪的原则布局设置，功能以商业服务（咖啡、茶座、冷饮、西餐、旅游品、照相等）为主，还有小型可移动式儿童乐园、下沉式游泳池等。

效益显著

工程于2002年元月动工，2002年9月竣工，历时8个月，国庆节第一天起向市民开放。

工程实施符合国务院对武汉市总体规划的批复要求，符合新世纪治水新思路 and 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工程拆除江滩各类杂乱无章建筑物、



1998年江滩旧貌

搬迁企事业单位、迁出常住居民，促进了企事业单位的发展，解除了常住市民常受洪水威胁的困境，极大地改善了江滩的环境，美化了市容，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协调。

工程对吹填形成的平台进行大面积绿化，禁止搭建任何房屋和其他阻水建筑物，大大改善了江滩的防洪条件，有利于防洪。

工程为武汉市民特别是中心城区市民，提供了一个绿色亲水空间和文化休闲乐园，有利提升市民的生活质量。同时，为武汉旅游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突出滨江滨水城市特色的新景点。

继往开来

武汉市率先实施汉口江滩防洪及环境综合整治（一期）工程，成为生态、水利建设示范性工程。

20年来，在这一工程的带动下，汉口江滩二期、三期相继完成；武昌江滩、汉阳江滩、青山江滩、洪山江滩、汉江江滩全面整治。现已建成的总长度达70公里（长江江滩45公里、汉江江滩25公里），总面积达784万平方米。人们赋予江滩美名：汉口江滩——主打休闲；武昌江滩——重在观景；汉阳江滩——弘扬大禹；青山江滩——海洋公园；汉江江滩——运动休闲。

武汉江滩呈现三大特点：一是江滩绿化覆盖率达90%，形成生态江滩——城市



2020 汉口江滩新景

绿肺；二是“运动在天水绿荫之间”，成为活力江滩——全民健身；三是在一期建成长江水生物浮雕的基础上，相继建成大禹神话园、码头文化广场、粤汉码头文化园、横渡长江博物馆、万里茶道、国际友谊林等文化景观，形成文化江滩——魅力无限。如今，江滩年均接待游客量达1500万人次。

武汉江滩光环四射，先后荣获“全国优秀体育公园”（2005年）、“国家水利风景区”（2008年）、“武汉十大城市文化名片”（2013年）等称号。2017年，青山江滩荣获C40城市奖“城市的未来”奖项。

放眼两江四岸，昔日的杂乱滩涂、防洪险点，成为了开阔舒适的绿色滨江长廊、凝聚文化艺术风貌的休闲场所、充满人文关怀的城市绿色客厅，呈现出人水相依岁月静好的城市景象。

吴世纬，武汉市水务局原巡视员

英国发现 1927 年中华全总致驻华水兵公开信

◇ 胡全志 范 榕

英国网站惊现汉口发出的“毒传单”

今年 5 月 1 日，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 97 周年的日子，旅居英国的武汉收藏家范榕（本文作者之一）披露，他在英国 V&W 驱逐舰协会网站的链接网页上，发现了一封 1927 年 5 月 16 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写给各国驻华水兵》公开信传单，其收藏者是原英国海军“伍尔斯顿号”驱逐舰军官唐纳尔·斯科特·麦克格拉斯中尉（Donal Scott McGrath），该驱逐舰 1927 年曾在武汉服役。

这封公开信是从汉口发出的，当时正值中国大革命时期，英租界当局和海军视为“毒传单”，予以严禁和销毁，因此能保存至今极为罕见。经查阅地方志和工运史料，尚未发现与之相关的文献记录，它很有可能是唯一存世的实物。

这封公开信尘封已有 95 年，它记录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以下简称“全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反帝斗争的活动踪迹，是全总在汉口开展革命运动的重要文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将为正在复建的全总汉口旧址纪念馆充实馆藏，同时为研究早期工运史提供了难得文献。

《写给各国驻华水兵》原件英文版，铅字印刷，全文译成中文为 1105 字（范榕译）。

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中有的人刚刚来自欧洲，有的来自美国，还有的来自日本，你们是被各自国家的政府派到中国来的，为什么他们要派你们到这个国家来？是不是他们告诉你们中国人是野蛮人，并且你们国家侨民的生命和财产都处在危险之中？你们被各自政府骗离了甜蜜的家园来到中国，当时你们远离中国，根本不知道中国的实际情况。现在你们已经

到达了 中国，你们是否亲眼目睹中国人真是野蛮人？你们是否调查了解到侨民的生命和财产真的是处在危险之中吗？难道你们的侨民在中国不如在自己的国家安全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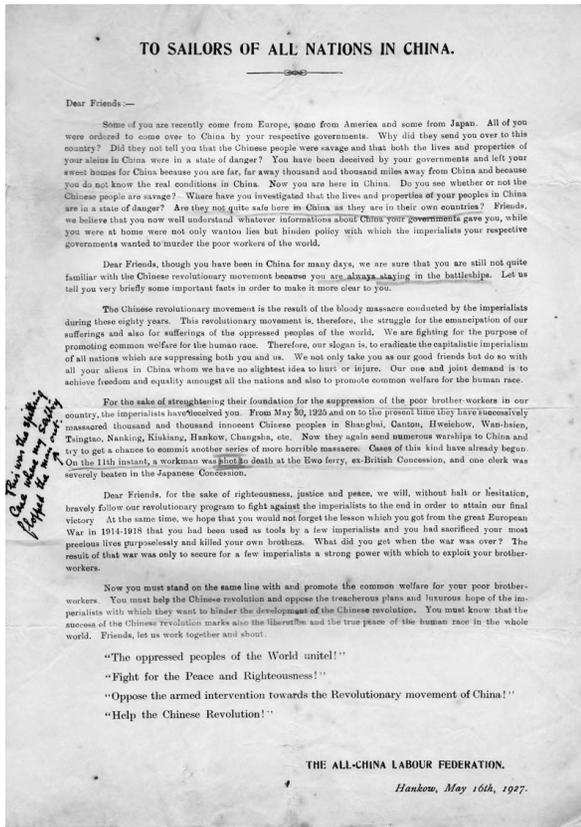
朋友们，我们相信你们现在已经知道了，你们政府告诉你们有关中国的情况不仅是大谎言，而且隐藏其中的是帝国主义企图谋杀世界上穷苦工人的政策。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虽然到中国已经有些日子了，我们可以肯定你们还不了解中国的革命运动，因为你们常常待在军舰上。让我们非常简单地介绍一下重要事实，以便你们了解情况。

中国革命运动是因为这八年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大屠杀而爆发，因此中国革命运动是为了我们的解放事业而斗争，同时也是为了解放全世界所有被压迫的人民而斗争。我们为了促进人类的共同福利而战斗，因此我们的口号是铲除共同压迫你们和我们的资本帝国主义。我们不仅把你们当作我们的好朋友，而且没有丝毫想法去伤害你们所有在中国的外国人，我们的一个共同要求是争取全世界的自由平等，并且促进全人类的共同福利。

帝国主义为了强化其基础，打击我国穷苦工人兄弟，欺骗了你们。从 1925 年 5 月 30 日到目前为止，帝国主义已经在上海，广州，万县，青岛，南京，九江，汉口，长沙等地连续屠杀了成千上万的无辜中国人。现在他们又派遣了大量的军舰到中国来，企图寻找机会来进行另一系列更加恐怖的大屠杀，这种事件已经开始发生，11 日在（汉口）原英租界轮渡码头一名工人被射杀，并且在（汉口）日租界一名职员被打成重伤。

亲爱的朋友们，为了正义、公道、和平，



英国“伍尔斯顿”号军官收藏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写给各国驻华水兵》公开信英文版原件，由唐纳尔·斯科特·麦克格拉斯的孙子提供

我们将毫不犹豫，勇敢地按照革命计划，与帝国主义战斗到底直到最后的胜利。同时我们希望你们不要忘记 1914 年到 1918 年期间欧洲大战的教训，在大战中你们被帝国主义当作工具使用，你们毫无目的牺牲了最宝贵的生命，并杀死了你们自己的兄弟。战争结束后你们得到了什么？战争结果仅仅是确保几个帝国主义有了强大力量来剥削你们的工人兄弟。

现在你们必须与你们的穷苦工人兄弟站在同一边，以确保你们的共同利益。你们必须帮助中国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的奸诈计划以及他们企图阻碍中国革命发展的奢望。你们必须明白中国革命成功是解放全人类和全世界真正和平的里程碑。朋友，让我们

一起努力并且高呼：

“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团结起来！”

“为和平与正义而战！”

“反对武力干涉中国革命运动！”

“援助中国革命！”

中华全国总工会

1927年5月16日汉口

中华全国总工会创建历程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1921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了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特立任总部主任。1922年7月迁到北京后，邓中夏任总部主任。

1922年5月1日至6日，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173人，代表有组织工人30万余人。大会决定以中国



当年英国报纸报道，英国海军军官在“龙和号”民船上搜查全总的“毒传单”

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人团体的总通讯机关，并由它负责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通过了10项决议案，其中《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规定了筹备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方法和步骤。

1925年5月1日至7日，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281人，代表有组织工人54万余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信祝贺。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选举产生了领导机关，宣告正式成立。全总第二届执委会委员共25人，林伟民当选委员长，刘少奇、邓培、郑绎民当选副委员长，邓中夏任中共全总党团书记。

1926年5月1日至12日，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502人，代表有组织工人124万余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祝词。选出全总第三届执委会委员35人，候补执委17人，苏兆征当选委员长，项英当选副委员长，刘少奇当选秘书

长。1926年9月，全总在汉口设办事处。1927年2月，全总机关由广州迁到汉口，在广州设办事处。

1927年6月19日至28日，在汉口召开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420人，代表有组织工人300万余人。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致辞。选出全总第四届执委会委员35人，候补执委20人，苏兆征当选委员长，李立三当选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各地工会开始转入地下活动。1927年9月，全总机关秘密迁到上海。

从上述沿革中可见，1927年5月16日印发《写给各国驻华水兵》公开信时，全总主持工作的主要负

责人分别是委员长苏兆征、副委员长项英和秘书长刘少奇。三人都是中共党员，都有丰富的工人运动组织领导经验。

苏兆征读过三年私塾，有一定文化，并长达20多年在外国轮船当海员，熟悉英文。苏兆征1908年加入同盟会，积极参与反清活动；1921年3月，与林伟民等组建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会；1922年1月，参与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任罢工总办事处总务部主任、海员工会代理会长等职；1925年5月，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全总执行委员会委员；五卅惨案发生后，为支援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他与邓中夏、李启汉等领导香港和广州沙面工人举行省港大罢工，推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领导工人坚持罢工斗争16个月。

在《苏兆征文集》中，收录了作者1924年6月《致某国海员信》、1924年11月8日《论海员团结之意义》、1927年4月21日《致广州政治分会及广东省政府的公开信》及《致省港罢工委员会暨罢工工人的公开信》等，由此推测，1927年5月16日的公开信，有可能是由他亲自执笔撰写。若能进一步确认，《苏兆征文集》中又可补录一篇他的轶文。

《写给各国驻华水兵》的历史背景

1927年，是疾风骤雨的一年，武汉作为全国政治中心，发生了很多的大事。

1927年1月3日，武汉五六十万民众为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胜利举行庆祝大会，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与英租界毗连的江汉关广场发表讲演。英帝国主义分子如临大敌，调集大批武装水兵登陆，以刺刀驱杀人群，一名海员当场被刺身亡，数十



当年英国报纸报道，英国水手销毁从“龙和号”民船上发现的“毒传单”

名群众被刺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三”惨案。

英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武汉人民的极大愤慨。当日，正在主持湖北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的李立三、刘少奇得悉惨案消息后，立即组织全体代表举行声讨大会。当晚，大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通过了对英斗争六项条件，要求武汉国民政府解决。同日晚，武汉国民政府对英领事提出抗议，限在24小时内撤退水兵和义勇队，解除其武装，由中国军队派兵进驻英租界。

在工人纠察队的带领下，以码头工人和海员为主体的数万武汉工人向汉口英租界挺进。4日晨，英国水兵陆战队被迫撤至江心军舰。其后，卫戍司令部派兵三个连、省总工会派工人纠察队员300人，进入租界驻防。

4日上午，湖北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为反对英水兵惨杀同胞通电》，强烈要求收回英租界。4日中午，刘少奇在武汉工、农、商、学各

界 200 个团体 500 名代表举行的联席会上，阐述了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会的六项条件，受到与会代表的拥护。联席会在省总工会“一大”六项条件和省党部对英方针的基础上，制定了对英“八项条件”。会后，刘少奇、李立三、林育南、许白昊、项英等分别代表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前往武汉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政府按“八项条件”向英国领事提出严正交涉，限英领七十二小时内圆满答复，如不答复，即请政府封锁英租界，收回英租界，收回关税，不负责在华英人的治安。

1月5日，在湖北省总工会领导下，以工人为主力的武汉 30 万市民涌上武汉三镇街头，举行反英示威游行。愤怒的群众一路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英租界”“为死难同胞报仇”的口号，向汉口英租界进发。他们推倒英租界的铁丝网、沙包等障碍物，冲进租界，升起了我国国旗。

“一·三”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中华全国总工会均发表宣言，抗议英帝国主义屠杀武汉人民的罪行，声援武汉工人的反帝斗争。在武汉工人和各界人民的支持下，5日下午，武汉国民政府成立了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对英租界实行管理。2月19日，英国政府代表被迫在《关于汉口租界的协定》上签字，同意将租界交还给中国，3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收回了汉口租界。

收回汉口英租界后，英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千方百计进行报复。3月19日，英帝国主义指使汉口出版的英文《楚报》《自由西报》进行反革命宣传，攻击、污蔑武汉的工人运动。两报工人举行罢工，英帝国主义被迫撤换了报纸主编，表示不再刊登反革命言论。

1927年4月3日，汉口日租界发生“四·三”惨案，全市掀起了反日怒潮，召开工人和各界反日示威大会，要求立即撤退日本水兵及一切兵舰，收回日租界，严惩杀人凶手等。但是，此时的武汉国民政府已不是收回英租界时的国民政府了，特别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里的右派势力蠢蠢欲动，武汉工人运动的形势也开始出现逆转。

1927年5月16日全总在汉口发出的《写给各国驻华水兵》，是在“一·三”、“四·三”及“五·一一”系列惨案后写的。尤其是“五·一一”事件，据《江岸区志》（2009年）记载：“1927年5月11日，英国水兵在英租界二码头怡和公司趸船上无理刺伤中国工人刘小当。外交部长陈友仁派人调查后，向英领事提出抗议。码头工会要求撤退英水兵、赔偿医药费。次日，二码头英国兵舰突放枪示威。当晚陈友仁会晤英领事，提出：赔偿受伤工人医药费及治伤期间工资，严厉约束英水兵，担保以后不再发生此种事件。英领事同意，此事遂告结束。”事隔5天后，全总发出了这封公开信，是一份有力的反帝檄文。

据悉，今年7月，汉口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纪念馆即将开馆，我们此时披露《写给各国驻华水兵》，也是希望能给纪念馆增添一份独有史料，再现江城上空的历史风云。

胡全志，武汉市政府参事；范榕，武汉籍旅英收藏家，曾从国外网站传回近千幅武汉历史老照片，2017年4月在江汉关博物馆举办《换一只眼睛看历史：外国人镜头下的中国大革命历史影像记忆》展览